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通讯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2020年7月刊·第7期(总第46期)

本期要目

■ 思想前沿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支持外地非遗在京传承传播
复苏乡村旅游市场“快”字当头

■ “大系”平台

大系七月“留声”

“千年古县·千宝遗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华东六省一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推进会预通知

■ 学术视野

徽州撒帐歌中的伦理叙事

压抑与释放：论机智人物故事产生与流传的心理机制

■ 文化实践

《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甘肃调研收获多

目 录

■ 思想前沿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支持外地非遗在京传承传播.....	1
复苏乡村旅游市场“快”字当头.....	1
突出集群成链，培育发展新动能——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	2

■ “大系”平台

大系七月“留声”.....	4
“千年古县·干宝遗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华东六省一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推进会预通知.....	28
· 各地推进动态 ·	
大系出版工程辽宁影戏分卷踩“节点”推进.....	32
“枣庄故事分卷”编纂工作吹响“集结号”.....	33
宁夏拟放《大系》《集成》“双响炮”.....	34
“广西歌谣卷”线上线下无缝接.....	36
“青岛故事分卷”强化质量意识.....	37
“驻马店故事分卷”初见成效.....	38
《大系·小戏·黑龙江卷》群策群力.....	39
《大系·故事·四川卷》强调精细化作业.....	40

■ 学术视野

徽州撒帐歌中的伦理叙事（章玉政）.....	41
-----------------------	----

主 管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 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理论研究处

主 编

潘鲁生 邱运华

编辑部主任

王锦强

编辑人员

覃奕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
1号院32号楼B308

投稿邮箱

mjwydt2016@163.com

电 话

010-59759244

010-59759490

本期印刷：2020年8月

· 论文推介 ·

压抑与释放：论机智人物故事产生与流传的心理机制（陈金文）..... 44

文本：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惠嘉）..... 47

■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甘肃调研收获多..... 50

民间笑话村 专家线上评..... 51

抗疫故事会唱响爱与希望的赞歌..... 52

· 国际信息 ·

坦桑尼亚中国文化中心发起“云游非遗”活动..... 53

探索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新形式..... 54

思想前沿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 支持外地非遗在京传承传播

7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坚持科学保护、提高能力，秉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着力保护传承实践、传承能力和传承环境。

方案明确，到2025年，组织非遗传承人群参加研修和培训等各类学习，累计培训北京地区及全国各地传承人群不少于500人。同时，形成3个以上非遗国内外传播品牌，加强利用融媒体宣传推广，提高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国际化水平，扩大北京非遗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

方案提出，支持外地非遗在京传承传播。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的凝聚荟萃、辐射带动、创新引领、传播交流和服务保障的重要功能，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在京设有固定传承场所、开展传承活动3年以上、具有一定传承基础，在培养传承人才、开展传承活动等方面成效显著的其他地区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在京开展保护传承工作，根据取得的效果及影响力，可以择优按照规定享受本市代表性项目的相关政策。

（摘自中国经济网，原题为“北京：支持外地非遗在京传承传播”，2020年7月28日）

复苏乡村旅游市场“快”字当头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做好乡村旅游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加快市场复苏有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在乡村旅游领域全面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总体防控策略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市场复苏。

根据《通知》，各地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在对接政策服务、加快基建进度、推出新产品新线路、加大宣传推介、拓宽增收渠道、规范卫生服务、保障旅游安全、做好示范带头等方面做好相关工作。

《通知》明确，要适时推出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要集中向社会推出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引导乡村旅游点顺应疫情防控形势和大众旅游消费需求，推出自然观光、亲子陪伴、健康养生、休闲度假、身心放松等类型服务项目。促进乡村观光向乡村旅居、乡村生活转型，提升乡村民宿品质，开发乡村美食、夜间游览、深度体验、主题研学等产品。扩大“创意下乡”覆盖面，吸纳社会创意资源对接乡村，丰富乡村创意产品体系。鼓励一批有条件的乡村通过直播、短视频、VR等多种形式，在线展示乡村优美自然风光和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促进乡村旅游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

《通知》指出，要加大宣传推介。利用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资源优势，加大乡村旅游宣传。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发挥本级广播电视媒体平台作用，加大对本地特色乡村旅游产品线路的宣传推介。注重加强与数字文化企业、网络传播平台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动漫、游戏、短视频、纪录片等形式推进乡村优秀文化和旅游资源数字转化和网络传播，提升乡村旅游影响力和吸引力。

此外，《通知》还提出，充分挖掘利用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和农业资源，开发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

（根据《中国文化报》2020年7月20日“八方面举措助力乡村旅游发展”报道及中国政府网2020年7月17日所发《通知》全文综合摘编）

突出集群成链，培育发展新动能——农业农村部印发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

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要发掘乡村功能价值，强化创新引领，突出集群成链，培育发展新动能，聚集资源要素，加快发展乡村产业，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规划》明确，要坚持立农为农、市场导向、融合发展、绿色引领和创新驱动，引导资源要素更多向乡村汇聚，加快农业与现代产业要素跨界配置，把二三产业留在乡村，把就业创业机会和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规划》明确了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一是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统筹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支持农产品加工向产地下沉，与销区对接，向园区集中，推进加工技术创新、加工装备创制。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和技术集成基地。

二是拓展乡村特色产业。以拓展二三产业为重点发展全产业链，建设“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构建乡村产业“圈”状发展格局，培育知名品牌，深入推进产业扶贫。传承特色技艺，改造提升蜡染、编织、剪纸、刺绣、陶艺等传统工艺。弘扬特色文化，发展乡村戏剧曲艺、杂技杂耍等文化产业。做强产品加工，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清洁化、智能化加工厂，引导农户、家庭农场建设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用标准化技术改造提升豆制品、民族特色奶制品、腊肉腊肠、火腿、剪纸、刺绣、蜡染、编织、制陶等乡土产品。提升人文价值，更多融入科技、人文元素，发掘民俗风情、历史传说和民间戏剧等文化价值，赋予乡土特色产品文化标识。传承乡村文化根脉，挖掘一批以手工制作为主、技艺精湛、工艺独特的瓦匠、篾匠、铜匠、铁匠、剪纸工、绣娘、陶艺师、面点师等能工巧匠，创响一批“珍稀牌”“工艺牌”“文化牌”的乡土品牌。

三是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聚焦重点区域，注重品质提升，突出特色化、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打造精品工程，建设休闲农业重点县、美丽休闲乡村和休闲农业园区，推介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提升服务水平。建设民俗民族风情乡村休闲旅游区。发掘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欢庆的民俗节日活动、多样的民族特色美食和绚丽的民族服饰，发展民族风情游、民俗体验游、村落风光游等业态，开发民族民俗特色产品。开发特色文化，发掘民族村落、古村古镇、乡土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特征、地域特点、民族特色的乡村休闲旅游项目。开发特色产品，发掘地方风味、民族特色、传统工艺等资源，创制独特、稀缺的乡

村休闲旅游服务和产品。

四是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提高服务水平，丰富生活性服务业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培育主体、扩大应用、改善环境。

五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农业产业化升级版，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队伍、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推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多元融合主体，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建立健全融合机制。

六是推进农村创新创业。培育返乡、入乡、在乡创业主体，建设农村创新创业典型县、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孵化实训基地等平台，强化创业指导，优化创业环境，培育乡村企业家队伍。培育一批“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等乡土人才，以及乡村工匠、文化能人、手工艺人等能工巧匠，领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创办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等。

（根据农业农村部网站 2020 年 7 月 17 日所发文章“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及 2020 年 7 月 16 日所发《规划》全文综合摘编）

“大系”平台

大系七月“留声”

编者按：为积极落实大系出版工程的宣传工作，交流与推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各分卷编纂工作经验与调查研究成果，推动各地编纂工作协调发展，扩大民间文学影响力和社会宣传影响力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民协与《文艺报》联合开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专版”，已于 2019 年刊发大系出版工程 10 个系列的宣传文章，2020 年 6 月及其后每月将继续刊发专版内容。其中，7 月专版涉及神话、史诗和小戏，并行的征文主题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突破以往的文本作品的局限，从以‘文本为主’转变为‘文本与人本’并重，从以‘静态文字图片记录为主’转变为‘综合多元立体展现’。编纂过程中，如何以不同形式寻求和展现民间口头传统的本真性。”以下 6 篇文章围绕上

述主题展开讨论，原文刊发于《文艺报》（2020年7月31日第6、第7版），由于版面有限，报纸登载的是删节版，现将完整版呈录于此，供参考交流。

采录和展现语境中的民间文学

黄涛¹

采录民间文学的口头文本及其语境信息，最大程度展现民间文学的原貌，是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主要学术追求和工作创新之一。

民间文学是民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口头讲唱、身体展演的文学样式，以讲唱文字体现的文本只是民间文学原貌的一部分。这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显著区别，后者是作家在书斋中构想并书写而成的文学样式。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其语境之中。因而采录民间文学应关注其展演形态的完整样貌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民俗生活，并尽量充分地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手段把讲唱语言连同其语境信息记录下来并展现为搜集成果。过去以“三套集成”为代表的民间文学搜集成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采录和展示民间文学的语境信息方面存在缺憾。

以谚语的搜集整理为例。以前绝大部分谚语集子只是将谚语文本汇编起来，而不说明其讲述情境、“意在言外”的地方知识等，也不标注讲述者、讲述时间地点、采录者等相关信息，这就使得那些鲜活生动、特色浓郁的谚语变成语焉不详的干巴巴的句子，而且从科学利用价值来说是来源不明的不可靠资料。美国当代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对谚语的语境要素十分重视，他批评那种忽视语境的“收集古物式”民俗学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长长的谚语目录被刊登在民俗杂志上，没有有关其使用和意义的任何解释……没有语境的民俗文本本质上就类似于装饰着人类学与民间博物馆的墙壁并且为私人住宅增添光彩的大量外来的乐器。这些乐器和民俗文本一样是本真的，但是，乐器的音域，乐器的音调，乐器的功能以及乐器表演的复杂性都是鲜为人知的。”美国学者欧达伟通过考察中国农谚探讨中国农民文化史，特别强调谚语集应该注明谚语出处和谚语的使用情境。谚语出处指谚语的搜集者和讲述者的身份。他说：“我们的问题是：哪些谚语确实为农民所使用？我们

¹ 黄涛，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特聘专家、“俗语”专家组副组长，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能见到的大多数中国谚语集所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不注出处。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它线索，了解到某些谚语的传播范围，但无从得知收集者的身份——是受教育的文人学者，还是下层社会的市民或农民？以及他们的收集方法是什么？等等……我们应该指出，中国谚语集的编纂者，也基本是有教养的文人学者，除少数人注释过某谚出处，或许可以证明是出自村妇耕夫之口外，其余的大部分很难摸清来龙去脉。要使用它们，作为研究农民思想的证据，未免是在冒险。”关于谚语的使用情境，他说：“我认为，准确理解农谚的关键，是观察它们的使用情境……现代苛刻的民俗学者甚至倾向于否定没有注释的谚语，他们认为，不清楚谚语的使用情况，便无法着手进行研究。总之，他们所强调的，其实都是谚语的使用情境问题。使用情境包括：谚语被谁使用？为谁使用？在什么场合下使用？在什么时间使用？以及参与这种谚语文化的人们的自己的解释，等等。”他从谚语集的使用者和研究者的角度，说明了什么样的谚语集才是符合科学规范和具有使用价值的研究资料。他所强调的谚语搜集编纂的科学规范正是《大系》编纂所重视的工作原则和学术追求。

1998年7月我在河北省景县黄庄搜集到一条谚语：“休前妻，毁稚苗，后悔到老。”如果只将这十个字的谚语文本收到某个集子里，就显得干巴巴的，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也不能为读者充分理解。这则谚语在我搜集之前从来没有在文献中出现过。其中“毁稚苗”的“稚”字的发音在当地方言中同“知”音。我在与一位时年60岁、担任生产队会计的男性农民推敲几次之后，根据谚语的实际意思确定为“稚”字。这则谚语的意思是：老婆还是原配好，离婚不如凑合着过。这是当地故老相传的谚语，通常用于劝阻别人离婚，特别是老年人用它来劝诫年轻人不要轻易闹离婚，带有“老话”固有的权威性，能给后辈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其表意的效力主要是靠“毁稚苗”这个比喻来实现的。“毁稚苗”就是将头茬未长齐的庄稼幼苗毁掉，重新播种。农民依照农时播种豆子、谷子、棉花时，常出现头茬苗出土太少的情况，特别是种豆子。因为豆芽开始就是双瓣的，破土较困难，如果刚下过雨，地表结起硬皮，豆芽就难以出土，或者顶起硬皮，但无力将它完全顶开；用手替它揭开硬皮，又往往将豆芽也连带拽下来。豆种耩得太深了，豆芽也钻不出来。这样就造成出苗不够的情况。一般在播种五六天时，能钻出的豆芽就大部分出土了，到十来天

时，见该出土的已出来了，未出土的已无希望了，只得在未长出豆芽处补种，再过五六天，如补种的豆子仍然出土的太少，眼见这一茬豆子总体上出土情况太差，有的农民就把这茬豆子全部毁掉，重新播种。但如由于播种的时机已误了 20 天左右，或由于与前次类似的原因，重播后长出的豆苗往往还不如前次的，农民就十分后悔将头茬庄稼（也就是“稚苗”）毁掉：既浪费了豆种，又白费了力气。这种深切的后悔之情是每一个农民都有切身体会的。用这种耕作经验来比喻休掉前妻而后妻还不如前妻的情况，就分外生动、贴切，用这则谚语来劝阻别人不要闹离婚，就特别有说服力。这则谚语还包含着过去当地男子娶媳妇的一般经验：娶媳妇又叫“成家立业”，关系着本家族的传宗接代，是男性农民一辈子的头等大事，但很不容易。因为一般农民家庭经济拮据，娶媳妇要盖新房、送彩礼、买家具，花费巨大；尤其是一家如有几个儿子，为娶媳妇要花掉多年来省吃俭用的钱，甚至债台高筑。离婚再娶，对一般农民家庭来说就是败家的事，经济上难以承受，所以离婚不如将就着过；而如果离婚再娶的后妻还不如前妻好或者未能再娶，就会终生后悔。以上关于“毁稚苗”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农民关于婚姻的认识是这条谚语所包含的民俗生活信息，都是谚语所隐含的重要背景知识，非本地人一般从其字面上看不出来，而对本地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故搜集整理这则谚语需要说明这些语境信息。以上是那位老年村民对我讲述的内容。另外我还获得了另一位青年男性村民向我讲述的关于这则谚语使用情境的事例资料：1992 年 24 岁的他要跟前妻离婚，因为婚后感情不好，而且婆媳不和，头胎生了女儿后，他的母亲更是屡劝他离婚。这时邻居中的一位 60 岁高辈“大奶奶”就劝诫他：“休前妻，毁稚苗，后悔到老。差不多就算了，又有孩子了，凑合着过吧！”他听了感受到很大压力，但离婚之志已决，就诚恳地跟她解释：“大奶奶，不是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大奶奶”见他不听，就带气讽刺他：“你不听，看离了你找谁去，现在说个媳妇容易吗？到时候你说不上媳妇，就得赶集称上五斤肉，晚上放被窝里抱着吧！”他听了很受刺激，6 年后提起此事仍然愤愤不平。这个事例也显示出当地两代人婚姻观念的差异，显示出这则谚语的实际效力的显著变迁：老年人将它当作应当遵守的信条，而这位年轻人已当它是“老俗套”了。将上述背景知识和事例资料写入这则谚语的释义，并注明调查时间地点、讲述人信息、调查者信息，就是对这则谚语的比较完整的解释了。这些信息基本包含了上面所

说欧达伟提出的谚语集应注明的全部内容。如果调查过程中已经获得了这些语境信息，但认知不到它们的重要性，在记录整理时只关注谚语文本，舍弃了语境信息，则为憾事。

有人说：谚语、谜语、俗语这些民间文学形式本身篇幅很短小，而附加的释义和相关要素说明却占那么大篇幅，不是很累赘繁琐吗？有那个必要吗？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充分认识语境信息的重要性，也没有充分认识这些短小精干的民间文学作品往往具有丰富的言外之意的特点。它们虽然形体短小，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所能起到的社会影响、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不一定比长篇体裁的民间文学少，我们必须把它跟长篇体裁的民间文学同等对待。不过，相对于收录史诗、长诗、神话、故事等篇幅较长体裁的《大系》卷本而言，如果对这些篇幅短小的作品都一一注明相关语境信息，《大系》的谚语卷、俗语卷、谜语卷的编纂确实更为艰辛、需要付出更多的工作量，但这样可以编出更有价值和趣味的作品集，这种付出是值得的。目前完成的《大系》稿件中已有按着这种工作规范成功编纂出的数种卷本。篇幅如此短小的作品体裁都能够注明语境信息，那些篇幅较长的作品体裁就更能做到，也更应该这样做。当然，这种文字解释和语境说明只是传达了民间文学最基本的语境信息，其现场展演的更为生动形象的情景信息并未展示出来。如果加上相关的图片、录音、视频资料，则能更多地传达语境内容，可将这些资料存入数据库备查，或者处理到卷本内与相应作品文字配套的信息码里，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看到这些视频或音频信息。

采录和展现民间文学的语境信息，首先应忠实记录民间文学的口头语言，对其所做的整理加工应最大程度保持讲唱原貌，体现其口头性和表演性；其次，可以在作品文本后面用“附记”“释义”等形式对讲唱现场情境、相关民俗生活、文化内涵、历史变迁、传承状况、调查过程等进行说明。第三，说明讲唱者、采录者、采录时间及地点、整理者、翻译者等相关信息。第四，可以酌情增加相关图片、录音、录像等资料。大系出版工程的最终成果主要为文字形式，对民间文学讲唱语境的载录受到文字媒介本身的限制，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再现其原貌，但按着编纂工作规范采录和展现民间文学的基本语境信息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须要做到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前沿学术取向发生了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

俗”的转型，民俗志书写、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成果也应该追求和体现这种转型。《大系》关于采录和展现语境中的民间文学的编纂原则体现了民俗学研究前沿学术潮流，也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符合民俗文化根本属性的重大创新。

蒙古族民间文艺珍稀遗产：蟒古思故事

宝音陶克陶¹

蟒古思故事是流传于内蒙古东部地区及辽宁朝阳、辽宁阜新、吉林松原、黑龙江大庆市等地区的一种曲艺形式，同时，也是蒙古英雄史诗地域性变异形式之一，从而亦被称作科尔沁史诗、科尔沁潮尔史诗等，到目前为止，内蒙古东部科尔沁部分地区仍有活态传承。究其起源，认为和佛教传播紧密相连。大体上，以北京—承德—喀喇沁—土默特—科尔沁为路线演变成型。起始时间则是元世祖忽必烈邀请西藏八思巴尊为国师、在京大建佛教寺庙之时。极有可能的是，当时的佛教僧侣们基于蒙古族史诗传统，创作出了佛教色彩浓厚的新史诗——蟒古思故事。元朝北京寺庙大量印刷的蒙古文经书、清朝隆福寺所印北京版《格斯尔》等，均可印证这一观点。当然，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据蟒古思故事流传特点，可推断蟒古思故事最初在北京、承德等受佛教文化影响较深的南部地区得以雏形，后沿着由南至北的路线传入蒙古地区。元朝建立后，蒙古族开始在上都或大都定居，特别是到了清代，南部和东部蒙古族逐渐弃牧从农。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成为蒙古族文化艺术变迁和发展的催化剂。清朝建立政权以后，清廷在蒙古地区施行了盟旗制度，“各部落之间的封建战争已经结束，接受了清朝的国家统治。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作为部落史诗的蒙古英雄史诗产生和生存的蒙古部落政治生活的根基不复存在。也就是说，蒙古部落被清朝的盟旗制度划定界限，被固定在一定的领域以后，实际上以部落之间或者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为特色的蒙古封建内战时代已经结束，同时也宣告了‘蒙古史诗时代’的结束。从此，蒙古英雄史诗在东蒙古地区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政治生活功能”，“不仅如此，在清代，内蒙古东部地区由于蒙地开垦，其经济生活方式由原来的游牧经济转向半牧半农经济。这样，作为英雄史诗产生的生活方式基础的游牧经济已经逐渐从东蒙

¹ 宝音陶克陶，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

古的经济生活中退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蒙古地区逐渐出现了定居的蒙古族农民，蒙古文化艺术也随之发生演变，在东蒙古地区出现了“变异史诗”——鳞古思故事。

鳞古思故事的一大魅力在于它所表现的思想内容。鳞古思故事主要描述圣佛、天神合力讨伐鳞古思，进而制敌伏魔、扬名立万的情节，反映了人类追求美好、宣扬正义、保卫和平、和谐共生的生活理想。内容上涵盖宇宙初开、天地形成、万物生长、人世成型、神佛诞生、抢亲、结拜、战争、和平等广泛题材。如鳞古思故事的核心——《十八部嘎拉巴故事》（嘎拉巴，源于梵文术语“kalpa”，佛经汉译为“劫”，与“纪元”相近）的头两部故事《宝迪嘎拉巴汗》和《阿拉坦嘎拉巴汗》中，讲述了宇宙形成初期第一纪元和第二纪元的情形和天神与鳞古思之间的战争。“为镇压鳞古思，一位天子降临人世是流传于世界各地的一个母题。”鳞古思故事中天神与鳞古思征战的故事母题，经常出现在印度古代佛教作品中。后经西藏、中原地区，逐渐传入蒙古地区，与蒙古英雄史诗中英雄与鳞古思征战的故事结合，形成了新的独具特色的内容。

鳞古思故事绚丽多彩。首先，鳞古思故事篇幅都很长，通常以《十八部嘎拉巴故事》或《二十四部嘎拉巴故事》的形式出现，可与《格斯尔》《江格尔》媲美，被美誉为蒙古族第三大史诗。十八部嘎拉巴故事或二十四部嘎拉巴的故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通过具有传承关系的人物将独立情节串联，讲述完整故事通常需要千余小时。其次，鳞古思故事塑造出了众多极富个性的艺术形象。正面形象有宝迪嘎拉巴汗、阿拉坦嘎拉巴汗、特木尔赛恩德勒巴特尔、特古斯朝克图汗、道喜巴拉图巴特尔，等等。可汗通常以封建帝王角色出现，不直接参与征战，英雄则以保卫家乡、保护亲人，英勇讨伐鳞古思的形象出现。鳞古思是其故事中的主要反面形象，通常以阿日扎克黑色鳞古思、铁头鳞古思、犄角鳞古思、阿扎日鳞古思等凶恶形象出现，在抢亲情节中还会出现雌性鳞古思形象，如吉拉邦沙日鳞古思、桐胡拉沙日鳞古思、萨里黑沙日鳞古思等，均为多部故事中反复出现的雌性鳞古思形象。除此之外，还有英雄夫人、坐骑以及归顺的鳞古思、鳞古思师父等其他类型的形象。其中，归顺的鳞古思是较有特色的一种人物形象，此类鳞古思最初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战败后则臣服于正面人物，在之后的战斗中助力正面人物征服其他鳞古思。此类归顺者鳞古思形象在其他蒙古史诗中并不常见，是鳞古思故事中独有的一种人物形象，它从

侧面上展现了蟒古思故事的变异性，属于蒙古史诗后期发展的一种形态。再次，蟒古思故事的演述广泛采用民间文学口头程式。个别蟒古思故事以吟唱和叙事结合的形式演述，大部分则以单吟唱的诗歌形式演述。演述艺人在表演过程中只需记住故事梗概，其余部分则通常采用重复的口头程式来完成。蟒古思故事的步格、韵律结构、程式的形式构造、运用情况等都有其自身特质与规律，在口头程式方面它不但与国外史诗不相同，而且与蒙古族其他地区的史诗相比也有所不同。第四，蟒古思故事具有变异性特征。学界把蒙古史诗的发展分为原始史诗、发展史诗、变异或衰落史诗三个阶段。东蒙古地区的部落政治时代和游牧经济生活的终结，导致了其部落史诗时代的终止，使其丧失了政治与社会原有的功能和意义。在此条件下，产生了蒙古史诗新的变体——蟒古思故事。其变异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母题、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武器工具、生活场景以及其现实性等方面。与其他蒙古族部落和地区的史诗相比，蟒古思故事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其变异或衰落的特征明显，被学界认定为“蒙古史诗的尾声”。第五，蟒古思故事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其语言方面。蟒古思故事广泛运用蒙古族诗歌传统的口头程式与蒙古口头传统，以及对比、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并大量使用了民间谚语、格言、成语等；另外，还经常运用喀喇沁、土默特、科尔沁等多种蒙古语方言，甚至偶尔用藏语来表达某种特殊含义的现象。第六，蟒古思故事的表现手法具有韵文体和散文体结合、说唱结合的特征。蒙古族传统史诗是以诗歌形式为主，而蟒古思故事在传承过程中受到胡仁乌力格尔等说唱艺术的影响，形成了上述特征。演述时艺人用潮尔（马头琴等乐器）进行伴奏，后期也有用四胡伴奏的。因此可推定，蟒古思故事不仅成功传承了蒙古族固有的口头传统的抒情和叙述手法，还在曲调、乐器方面另辟蹊径，继承发扬了蒙古族说唱艺术传统。

国内外学者对蟒古思故事的关注或研究工作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的。德国的瓦·海西希、俄国的谢·尤·涅克留多夫、B. 李福清、蒙古国的 S. 杜拉姆、日本的田中华子等学者对蟒古思故事都有所关注和研究。1957 年开始，国内学者道荣昶、波·特古斯、巴德玛、叁布拉诺日布、尼玛、乌云格日勒等人对蟒古思故事进行了整理。波·特古斯于 1978 年发表论文《试论蟒古思故事》，可谓是蟒古思故事专题研究的开篇之作。陈岗龙的《蟒古思故事论》是该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系统性的学术专著。他在丰富的田野

资料基础上，探讨了蟒古思故事与传统蒙古英雄史诗、中原文学、《格斯尔》《罗摩衍那》以及佛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从而科学揭示了蟒古思故事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等相关单位采取积极有效的各种措施，强化了抢救传统文化、民间艺术遗产的工作，从客观上为蟒古思故事的传承、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对现有文本进行整理、出版、研究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同时，陆续开展了发现蟒古思故事的新传承人、对蟒古思故事的口头文本进行录音录像、对其进行数字化管理、保护等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其中，值得特别提起的有两项工作：一是内蒙古艺术学院杨玉成教授牵头开展的民族音乐传承驿站工作；二是内蒙古民协启动的“内蒙古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杨玉成团队在2011年挂牌成立了民族音乐传承驿站，以聘任制等形式邀请民间艺人和传承人进站，在蟒古思故事逆向重建方面取得了值得赞赏的好成绩。“内蒙古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系列成果中，有由伊和白乙拉主编的《铁木尔森德尔巴特尔》《锡林嘎拉珠巴特尔》《宝鲁楚伦特纳格的故事》《阿萨尔查干海青》等《蟒古思故事丛书》四部文本，除《阿萨尔查干海青》外，其余三部是首度与读者见面。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蟒古思故事一度被学界认为已失去活态传承，处于众多文本濒临失传、人亡歌息的危急关头。所以，将蟒古思故事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纳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内蒙古分卷，是保护和抢救濒危文化遗产的重大举措，意义非凡。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将来会为广大读者源源不断提供更多更好的珍稀文本。这些可敬的学者和机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蒙古族民间文艺珍稀遗产蟒古思故事的传承、保护、发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民间小戏口述整理的“原生态”难题

江棘¹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摩登”（modern）等词语携其所附带的对于“现代”“文明”充满憧憬的价值判断，摧枯拉朽，无远弗届。而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高频地出现另一些概念：“有机”“绿色”的食品，周末“农家乐”的新式合家欢，跻身青年歌手

¹ 江棘，大系出版工程“小戏”专家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大奖赛的“原生态唱法”，网红李子柒的“归园田居”……争议虽众，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些标举“原生态”的概念，正在重新标识现代人“向往的生活”。

这样的氛围，无疑有助于全社会形成、增强尊重、保存、传承、发展民间文艺、乡土艺术的共识。但是作为专业人士，往往又会深感传承与发展间诸多掣肘，“强大的共识”与“脆弱的现实”并存。这当然是个过于复杂的问题，但在笔者看来，其中的一个基础性难题或许就在于：如何界定民间文艺的“原生态”？

这个难题由来已久。上溯至中国民俗学的肇始期，自北大《歌谣》周刊时期倡导对民间文艺进行“学术的”“文艺的”研究开始，在此后展开的诸多具有现代民俗学、社会学学科背景的采风和田野调查中，一代代学人都曾触碰过这个难题。例如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孙伏园、李景汉等人在河北定县的秧歌搜集整理工作，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草创期的扛鼎之作，体现了在当时最先进、科学的方法指导下，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整理工作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其成果《定县秧歌选》却难以如整理者所期望的那样“面向民间”，其出版发行后与定县秧歌的民间传承走了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当然，民间文艺自有其“口传心授”的传承路径，但在艺人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唱/剧本记录被日益倚重的当代中国，秧歌艺人内部也从不以《定县秧歌选》为底本依据，个中原因，恐怕正与其未能解决文本记录的“原生态”难题有关。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定县秧歌选》这个案例中，最直接最首要的原因，恐怕是作为整理者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艺，有着某种前置式、预设性的视角和立场，难免会以此为框架和标准，为对象截长补短，其中既有无意的“误读”，也有刻意的加工。当年孙伏园等人的秧歌搜集整理工作，隶属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工作，内中暗含着对农民进行文艺教育、语文教育的考量。虽然力求记录整理的“真实”，但是面对怎样的农民文学才是可供进行语文教育的样板这一问题，他们很自然地现出了启蒙者的姿态。这突出表现在用相对合辙押韵的规整文字，对干板徒歌、文体灵活自由、充斥大量杂字、衬字、口语字以及无法拼读的小音的定县秧歌进行“加工”，从而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其作为家长里短小戏，叙事冗杂的“九番”特征。对比 1940 年代民俗学者赵卫邦记录的定县秧歌《小姑贤》唱词和《定县秧歌选》中相同片段，我们不难发现这点。前者是“李瑞莲我正在（口

衣)厨房里呀给老娘做饭呐,忽听的呀我的老娘他叫我一声哽。我摆下钢刀喊我不搓菜(口衣),去到这庭前看一个明白噯(口衣)”,后者则成了“李氏正在厨房把饭做,只听得老娘唤一声。撂下钢刀不切菜,先到老娘草堂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秧歌选》的编者多少违反了其声称的“完全”“真实”原则,作了增强可读性的文句加工处理。这使得《秧歌选》偏离了口头文学的生活化实态,而更符合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民间口头文艺/文学那种琅琅上口的“理想”认知。实际上,任何一位整理者(哪怕是民间艺人自己)在对民间小戏进行选择、编辑、阐释的过程中,都难以抹去“主位”的视角,主要的差别一是在程度上,二是在其对于这种位差是否具有自觉。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剧种对象本身的流动性、复调性。民间小戏在长期的发展流变中,与本地及周边民俗、宗教、其他剧种和姊妹艺术都有着诸多复杂互动,其中影响也未必只有“口传”这一条路径,宝卷、弹词乃至传奇乱弹各种同题材文字的“换文”、挪用,是寻常之事。纸面文献的版本官司尚且聚讼纷纭,何况来源情况更为驳杂的小戏。另外,艺人、班社从自身条件出发,在时代、社会的整体性环境中,进行种种创造、顺应、调整的主观能动实践,亦贯穿于小戏发展历史长河始终。值得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诸多地方小戏也经历了“戏改”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整饬,有像大剧种学习、大量移植其剧目,或接受大剧种对口帮扶改良的经历,“戏改”所秉持的“大戏”审美观,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渗透,已经被不少地方小戏的民间艺人接受和消化。例如今天的定州秧歌(即原定县秧歌),就在1950年代的“戏改”中新增了弦乐,对于其他剧种和民歌曲调也多有吸收。在依字行腔、腔词关系紧密的方言小戏中,音乐元素的变化,对于唱词文本结构的影响不容小觑。而今天,作为定州(既原定县)秧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年资最老的第四代秧歌艺人,正是成长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剧种互相借鉴帮扶、汇演交流频繁的环境中。在传统戏方面,虽然有前辈艺人的口传心授,但他们所熟悉的,也多是经历过“戏改”的传统剧目和向梆子、京剧等大戏学师改良而来的音乐与功法,以及剧团集体合作打磨的剧目编创排演过程。由他们继续传承下来的、如今仍在定州演出的秧歌“传统戏”,已经很难说与民国时全盛期的定州秧歌还保持着完全一致的文本与演出样貌了。这种情形在今日全国各地的民间小戏中是极其普遍的。

“原生态”难题的另一个原因，是进行口述采访的现场环境。无需援引民俗表演理论以及口头程式理论，凭借常识我们也可以理解，哪怕是同一个剧目、同一批演员，其每一次的搬演，也会因主创者的状态差异和观众、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变化，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现场“文本”。然而民间小戏的文本记录整理，正是一个将气象万千的场上表演“案头化”“固定化”的过程，这必然导致大量与瞬时性表演及其环境相关信息的丧失。更为要命的是，近代以来不少民间小戏的整理工作，是以纯文字记录艺人“坐唱”“背唱”的形式而进行的，其间“活态”信息的耗损更剧。

由此可见，对民间小戏进行“原生态”地整理记录，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求真的追求却不能因这种“不可能”而止步。民间小戏多与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关系密切，富含着中国戏曲文化、民间文化的遗传密码，其中的诸多观念、形式，在今天一些精致成熟的大剧种中都有遗存，例如昆曲中的“魂旦”表现与目连的关联，莆仙戏中的“傀儡介”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然，历朝历代的诸多记录也并不完整、完善，但仍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信息。若古今连接，将各个历史断面的记录统合纳入到一个长时段中去，便可汇聚成庞大的中国戏曲“基因库”。在民俗土壤日益流失的今天，这种基于当下的记录所保有的认知价值就更显珍贵。

因此，不将“原生态”本质化，既充分意识到民间小戏的流动性与复调性，也坦然面对作为研究者在整理过程中的情感投入并对其抱有自觉，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与明智。先民之所以笃信那藏身戏影背后的鬼神，归根到底，是出于对自然、对上苍，对万物灵性的敬畏。这正是肖江虹在他的小说《雉面》中，努力打捞的正在远去的教诲——人总得有个“怕惧”。正是这样的情感内核而不是外在强烈的形式感，支撑起了民间小戏的基底；面对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血脉，我们走来的路，今天的整理者、研究者若不带丝毫温情，只有宛如实验室里甚至手术台上的冷峻操作，那也是很可怕的。

面对“原生态”难题，在态度上应当“趋而不迂”，而在具体操作中如何落实，这正是此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所努力探索的。与《定县秧歌选》等前人“样板”不同，《大系》并非作品集，而是含有很多解读和背景材料，包括方言语料、附记说明、图片、视频等，由此突破以往的文本作品的局限，从以“文本为主”转变为“文本与人本”并重，从

以“静态文字图片记录为主”转变为“综合多元立体展现”，力求呈现出民间小戏所具有的历史纵深感、流动感，对其发展历程的当代横断面进行多方位、“实景性”的记录。

2020 大疫之年，逼迫着正在发达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上急行的人类，放慢脚步，去重拾心头的那点“怕惧”，那份敬畏。面对可能强大、复杂得超乎我们想象的未知，我们可以留给子孙后代安顿身心的财富，除了上天入海的高科技，是否还有其他的可选项？从根本上说，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不是为了唱一首缅怀的挽歌，而正是为我们的后代保留下更多的可选项。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着无上温情也无比艰巨的责任，以《大系》为代表的新方法尝试，无疑更有利于将“共识”落实于可操作的“现实”；而打破“原生态”的执着，突出民间文艺与历史、当下的互动链接，亦正是指向与未来对话的可能性。

青藏神话概述

米海萍¹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青藏卷》立项于 2018 年 7 月，2019 年初完成初稿，经过相关专家的仔细而中肯的审阅，又一次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和目录内容的重新调整，于 2020 年 6 月完成，共计 62 万字。青藏神话卷分为“诸神起源神话”“宇宙与万物起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及“其他神话”5 个部分。

神话是用叙事语言和象征手法来讲述人类的超越性故事，通过解释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文化起源等终极问题来认识世界，并为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提供神圣性的合法证明。神话作为人类最早创造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基本价值观的基础和象征性的规定，通过对宇宙起源、世界来历、万物的形成及人类诞生过程的叙述，给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神话表达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宇宙观、世界观和宗教观，同时对一个民族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千百年来，生活在青藏地区的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门巴族、珞巴族等世居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带着乐观积极进取的情怀，书写了神圣而壮丽的神话篇章。

一、诸神起源神话

¹ 米海萍，《大系·神话·青藏卷》主编，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诸神起源神话主要讲述青藏高原各民族神的起源、相互之间的征战，尤其讲述诸神的神奇诞生及种种奇异事迹。这类神话在各民族中都有流传，如山神、湖神、战神、牧神、家神、火塘神、房脊神，还有少量圣王神话。但流传的数量不多。典型的有汉族的《女娲与伏羲》《尧访舜》《聂赤赞普降人间》，藏族的《山神之祖沃德功杰》《阿尼玛卿山神的来历》《赤肖杰姆女神》《藏民家神的来历》《九战神的来历》《马桑的牧神》。

二、宇宙与万物起源神话

宇宙与万物神话通过解释宇宙起源、江河湖海等自然形成、动植物来历等，表达了青藏高原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宇宙观，探讨了宇宙的形成过程，是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精神遗产。如藏族的宇宙起源神话，解释世界的来源，为人类提供生存的宇宙背景，阐述社会秩序合法性。其宇宙起源母题最能体现出藏族关于大生命的思索与崇拜。在十余则宇宙起源解释神话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肢体化生说(A610)、大海变陆地说(A620)、卵生说(A625)、天地混合说(A625.2)、开天辟地说(A641)、绷天绷地说(A640)。

《珠穆朗玛五仙女》讲述了藏区的女神崇拜：喜马拉雅山脉以珠穆朗玛峰为首的5座山峰，是“长寿五仙女”。最初，喜马拉雅山区，低处是汪洋大海，岸上是无边森林，林中有奇花异草。不幸的是，海里出现了一头巨大的五首毒龙，给人类和动物带来灾难。在危难时刻，天上飘来5朵彩云。彩云变成5位仙女，降服了毒龙，救助了飞禽走兽和人类。经地上生物的再三请求，5位仙女答应永远留下来护卫家园，从此便成了喜马拉雅山区的地方神。其中，翠颜仙女是珠穆朗玛峰的主神，掌管人间“先知神通”，吉寿仙女掌管人间福寿，贞慧仙女执掌人间农田耕作，施仁仙女执掌人间畜牧生产；冠咏仙女掌管人间财宝。姐妹五人关心黎民疾苦，万年不辞辛劳，博得人们的敬爱与景仰。

门巴族《创世说》完整地讲述了天和地、太阳和月亮、人类的产生：从前地上没有人，只有天神两兄弟，一个是拉旺布加钦，一个是拉旺布拉钦。他们去须弥山根的海里，用法棍左搅三次，出来了太阳，右搅三次，出来了月亮，太阳和月亮结为夫妻。拉麦神的儿子叫萨的九头龙来偷太阳装火种的陶罐，两兄弟战胜了九头龙。天神打开陶罐，火越烧越旺，火光冲到天上，有了雾和云，慢慢往下滴水星，水星变成了水滴、水珠，整个天上都降了雨。从此，地上长出了草、树，水珠掉在石头上，变成了各种动物。九头龙和太阳斗，他

用黑体遮住太阳时，就是日全食，太阳竭力反抗，被遮住了一角时，就是日偏食。九头龙和月亮斗，遮住月亮时，就是月全食，月亮竭力反抗，被遮住一部分，就是月偏食。月亮和太阳结合后，要长给光明，一年才见一次面。夏天太阳从右往左转，天长光强；月亮从左往右转，从山顶上转，冬季太阳升高，和月亮相会。藏历五月，是太阳和月亮夫妻相会的日子。冬天太阳走了，升高了，热气带走了，所以，冬天寒冷结冰，月亮上全是冰，没有雨，所以夜长。太阳和月亮的光芒照到地上，天和地也结婚了，现在人是天地的后代，人的母亲是地，父亲是天。

门巴族的这则神话解释了天地、日月星辰和世界万物的来源，说明了日蚀、月蚀的形成，诠释了冬天短和夏天长的原因，进一步解释了人的来历。门巴族对大自然、宇宙和自己身边的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乃至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解释，但如此天真而艺术性地解释宇宙自然和人类现象，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难能可贵。把地作为人类母亲，天是人类父亲思想，与汉族先秦的“天父地母”，天为阳，地为阴，天地相和，化生万物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体现了门巴族对宇宙万物的哲学思考。

撒拉族《地震的由来》神话解释了地震现象，撒拉语叫“耶尔太热根冬巴合”：在一片汪洋大海中，有一条很大的鱼，鱼的身上驮着一头牛，而牛角顶着地球，牛的四条腿分别支撑东南西北四方，无数根牛毛分别管理东涯（世界）的某个地方，倘若某方的牛毛打颤，该地方就会发生地震，人们便认为这个地方的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这则神话说明了撒拉族古老的宇宙运动观念和地震观念，地震鱼和地震牛的出现，证明了撒拉族先民经历了漫长的渔猎文化时期和游牧文化时期，这则神话正是撒拉族从渔猎文化向游牧文化过渡的反映。

三、人类起源神话

人类起源神话，典型的有藏族的《赤杰曲巴创造世界》《神猴与岩魔女》，珞巴族的《人和猴子为什么不一样》《阿巴达尼和阿巴达洛》《阿巴达尼的四个儿子》《天神三兄弟造天地》《世界形成与人类由来》等卵生起源神话，记载于描述世界起源的苯教经典《黑头凡人的起源》：

很早以前，赤杰曲巴法师把五种本原物质收集起来，放入自己体内，然后轻声默念：

“哈”，由此产生了风。当风以光轮形式飞快旋转之时产生了火。风吹得愈猛，火烧得愈旺，热水和冷气产生了露珠。在露珠上出现了微粒，微粒被风搅飞，堆积成山。世界就是这样由赤杰曲巴法师创造出来。

从五种本原物质中又生出光卵和黑卵。光卵呈方形，大如牦牛；黑卵呈锥形，大如公牛。法师用一光轮敲出光卵，轮卵碰撞产生了光，散布在天空，形成了托塞神；光线下射产生了达塞神。斯巴桑波奔赤白人从卵心中出现，他长着青绿色头发，是现实世界之王。

斯巴桑波奔赤，就是苯教经典里的“斯巴坚谟”，意为“宇宙之父”，曲杰坚谟就是“斯巴坚谟”意为“宇宙之母”。世界上诸多宗教在形成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把初民创作的神话吸收于教义中，来作为宗教体系的原初性、神圣性证明。藏族苯教吸收了神话内容，并纳入其经典之中。经过苯教经典的记载，有关斯巴创世神话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保存。

《黑头凡人的起源》还记述说：最初从五种本原物中产生出雨和雾，形成了海洋。风吹海面吹起一个气泡，气泡跳到兰色的卵上碰碎了，从中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女人，名叫曲坚木杰谟。另外，从一个发亮的卵（白色的卵）的中心产生了有绿色头发的白人斯巴桑波奔赤。他们没有触对方的鼻子就结合了，生出了野兽、畜类和鸟类。他们低下头，触了触鼻子结合了，生下了九个兄弟，九个姐妹，以后由他们分别繁衍成天神和人类等，另外从一个黑色的卵中心跳出一个带黑光的人，名叫闷巴塞敦那波，是虚幻世界的国王。他从自己的影子里衍生出顿显那莫，两相结合生下了八个兄弟和八个姐妹，成为恶魔族类的祖先。最有趣的是，作为神和人祖先，九姐妹中的二姐南曼噶莫，就是《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王的姑母，她在关键时刻总是给格萨尔王以有益的指导，使他在人间建立了丰功伟业。人类起源神话表明，人类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力量，产生了自我意识和觉醒，渴望探明人类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奥秘。

土族《阳世的形成》中说人类之初，世间没有陆地，一片汪洋，神人想制一片陆地，但找不到任何可以撑得住土地的东西。一日，忽然看到一只金蛤蟆漂浮在水面上，便由空中收一把土放在其背上，可蛤蟆立即沉下水底，那土冲得无影无踪，神人生气了，取下弓箭，等蛤蟆再次浮上水面时，朝它射了一箭，射穿了它的身体，神人趁机放了一把土，蛤蟆翻身抱住了这把土，再也沉不到水底了，从此便有了阳世。神话中的神人是一个征服自

然，最终以胜利显示出人类无限征服力量的形象。神话中天神想创造阳世，但满目是水光找不到一根能支撑阳世的依托之物，点明天神是在“水中造阳世”这一观念。“水”白茫茫一片汪洋，正是人类史前有关“洪水泛滥”事实的反映。从弓箭的出现及创世神的男性特征来看，当时的土族社会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对天地形成作出了自以为是的解释后，原始初民把好奇的目光投射到了人自身，探究人类的起源。

四、文化神话

在神话叙述中，创造之神成为文化和道德的再造者，是人类的文化英雄。

藏区流传的《四季的来历》：古人传说，很早很早以前，在大地上并没有春夏秋冬之分，那时候到处草木茂盛，庄稼年年丰收，粮食多得简直没处装，各种牲畜也很多。后来，因为米面很多，人们根本不把米面当一回事，大家常把面和成面团给小孩子擦屁股，牧民们常用酥油泥锅台、泥牛羊圈。斯巴老人看到人们不爱惜粮食，十分痛心。他想了一个办法来，把一年分为四季，让各种庄稼和草木半年生长，半年休息，这样食物就有限了。

从此以后，人类过着既不富也不穷的日子，这才知道爱惜米面。从那以后，谁也不敢拿面团给孩子擦屁股，不敢拿金色的酥油泥锅台和牛羊圈了，还怕弄不好会饿肚子，大家开始勤俭节约过日子了。

这类与文化有关的神话，多体现出人类出现后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象征意义。主要以违反原罪被创世神斯巴惩罚，重新建立新文化有关：斯巴老人（即创世者斯巴）创造世界是人“自然性”的初生，看到人类奢侈浪费的现象，进而对人类的惩罚，则是赋予人类“文化性”的再生，或者说是相对于人类罪恶及原罪反思，这正如个体的自然人必须再经历一次文化的再生，进而变自然界的人为文化的人一样，故所以说“自然与文化是神话所处理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无论对于文明人还是原始人来说，文化的存在都比自然性的存在更为重要”。斯巴既是世界的开创者，又是人类文化的缔造者，一身兼有两个神格。在《谁教人学会了种田？》中，他还教给人类种庄稼。

《混沌周末歌》被土族视为千歌万曲的“根谱”，是“道拉的根本”，在男婚女嫁的婚礼过程中隆重演唱，由《起唱》《混沌》《开天辟地》《人类的起源》《周末》五部分组成，包括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人类起源及儒释道三教创立等内容。用汉族神话和

文化人物解释天地形成、人类诞生、三教创立；又运用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和古老神话对汉族神话内容进行了增补和充实，既凝结着深厚的汉民族文化内涵，又散发着浓郁的本民族风味。

五、其他神话

这类神话非常有趣，但比较复杂，涉及民间崇拜与信仰、宗教高僧的种种神奇、藏区格萨尔王英雄事迹等。还有一些是珞巴族、门巴族的系列神话，如《阿宾金纳》《阿宾肯日》《宾鸟追马》《冬尼海依的两个孩子上天》《阿巴达尼和达阶》《阿巴达尼和阿巴达洛的矛盾》《阿巴达尼救阿巴达洛》《阿巴达尼兄弟和宁崩乌佑》《阿巴达尼和亚洛比列》《若列打虎》等。这些神话都是原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意识形态，通过人类童年自发、幼稚的幻想曲折地反映客观世界，传递着青藏高原各族民众对史前社会的模糊记忆和来自人类童年时期的可贵信息。在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彼此汲取有益文化因子，融入自己民族的神话体系中，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性。同时记录了高原多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宇宙、自然界的认识 and 解释，是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和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英雄史诗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新时代的使命：以《玛纳斯》史诗为例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¹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创造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玛纳斯》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

别林斯基指出：“史诗是在民族意识刚刚觉醒时，诗领域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玛纳斯》史诗以口头艺术超文本的形态吸纳了柯尔克孜族先民的历史、语言、文化、民俗、哲学、伦理、道德、美学、医学、军事、地理、天文、音乐、口头传统、民间文学、民间法规和仪式及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以口头演述的形式传承和记录了柯尔克孜族千百年来的历史集体记忆，展示了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统、生活经验、审美

¹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大系出版工程“史诗”专家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情趣和伦理道德。史诗蕴含着柯尔克孜族民众特有的精神文化、思维方式及艺术想象力，彰显着柯尔克孜族精神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堪称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化的巅峰之作，有学者称其为“柯尔克孜族的民族魂”，学界誉其为“柯尔克孜族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2014年，我国《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在96岁高龄时驾鹤仙逝，他被国际史诗学界誉为“21世纪的荷马”，其演唱的文本在内容的系统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的艺术性等方面堪称是目前我国所搜集到的近百位“玛纳斯奇”的演述文本中的经典。史诗以英雄玛纳斯家族八代的生活情境和英雄业绩为线索，以娓娓动听的故事，节奏紧凑的诗歌语言，描述古代柯尔克孜族先民生动的生活画卷和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

从叙事结构上讲，《玛纳斯》史诗是典型的以英雄人物身世为核心叙事结构的口头史诗。居素普·玛玛依所演唱的文本共计23万多行，包含了《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耐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台》等英雄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9个人物的故事。玛纳斯既是第一部英雄主人公的名字，同时也是第一部史诗的名称。从广义上讲，也是8部史诗的总称。以史诗主人公命名是柯尔克孜族突出的口头文学传统。目前所搜集到的近百部史诗作品均如此。《玛纳斯》史诗的所有情节都围绕着英雄主人公的人生轨迹逐步展开，并按照主人公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时序展开并延伸。每一部的主人公分别通过自己的人生轨迹、英雄业绩、人物关系、情感纠葛和敌我矛盾将该部史诗的故事情节贯穿起来。8部史诗之间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的结构关系。每一部的情节和结构也都自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史诗歌手玛纳斯奇以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不同的口头叙事艺术表现手法，展示出各部史诗独特的艺术效果。每部史诗都有头有尾，独立成篇，并可以单独演唱也可以根据当时语境从中选出最适合的传统诗章进行演唱，从而使得结构上相对独立的单部史诗或其中著名的经典传统诗章独自流传于民间。8部史诗之间的结构关系犹如一个彼此关联的大链条，每一部史诗又犹如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扣，环环相扣，每一个环扣又由很多引人入胜的母题、主题及比这稍大的故事情节范型所组成，最终构成一个宏大而完美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宏大结构链条中，各环之间的衔接至关重要，代表着各部之间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关

联一方面通过人物之间的亲属、友情、亲情关系及敌对矛盾关系产生关联，另一方面通过叙事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得以维系。史诗第一部到第八部主人公都是父子祖孙这样的家族血缘关系，而像英雄母亲、贤妻良母这样的一些地位不亚于男性的很多女性形象也同样在这种情节关系链中起到重要的衔接作用。除了这种简单的血缘关系外，与家族相关联的前辈，结义兄弟，敌我双方的一些重要人物之间的矛盾，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利益冲突、草原及马匹的争夺，甚至英雄主人公与神奇的骏马、猎鹰、猎犬及其他一些神性动物与主人公之间的神秘关系也会影响史诗后续内容的延续和发展，并且成为史诗后续情节发展的多重纽带和连环。史诗的故事情节和矛盾事件也此起彼伏，彼此交叉、纠结，前面的矛盾和事件成为后续情节的伏笔，不断激活后续的内容，从而把史诗的内容引向深入，推向高潮。而所有这些内容都通过史诗歌手玛纳斯奇的如簧之舌，在延续数天、甚至数月的演唱中得到演绎。虽然，史诗歌手的口头演述中，每一部史诗的内容和结构在语言上具有程式化特征，但每一部史诗的英雄人物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史诗的每一部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故事内容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史诗塑造和歌颂的人物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家乡的安宁，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团结本部及周边不同部落的人民，共同抗争外来入侵之敌，受到人民爱戴和敬仰的理想英雄形象，与此同时也深刻细致地反映了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思想情感和道德准则，具有感化听众，教育后人的艺术功能。因此，《玛纳斯》史诗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二

史诗，尤其是英雄史诗主要以战争、婚姻、结盟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内容，而这些都是以诗歌语言的程式化形态由史诗歌手“玛纳斯奇”加以口头演述和传承。所以，史诗歌手不仅仅是它的口头演述者，也是史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当然，史诗歌手的演述也不是面对听众简单地吟诵记忆在脑海中的史诗文本，而是在一种精神高度集中，神情兼备，语言生动流畅，与听众互动演述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这种演述犹如一个人的戏剧表演，是一种面对现场听众在传统的即兴创作的高度压力下的“表演当中的即兴口头创作活动”。史诗的演唱活动具有浓厚的表演色彩。歌手和听众共享一个舞台，歌手演唱伴随着听众痴迷的观赏以及不时地发出呐喊、鼓励、鼓掌，以此激发歌手的演唱情绪，调整现

场氛围。一个完美的现实语境可以为创造出经典的史诗唱本创造条件。歌手的每一个唱词诗句的变化、每一个唱调的调整、每一个情绪的波动、每一个眼神动作的变化都与史诗故事情节的发展相关联，不断地将史诗故事推向高潮。一位正在演唱史诗的歌手一旦进入了史诗深度的演唱氛围中时，会随着自己的演唱在与听众的互动中将自己融入史诗内容当中，以一种戏剧化的形式，演唱者不仅是以故事讲述者的身份出现，而且会以史诗中的不同人物的身份，甚至动物的身份出现，在演唱中模拟不同人物甚至动物的口吻、动作、表情、音容笑貌、情绪、行为，有声有色地将史诗演唱到极致。

歌手可以根据不同的演述语境，在遵循和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在传统的限定之内对自己正在演述的内容加以适度的调整，或删繁就简，或添枝加叶。歌手的创新不是对于传统的颠覆和更新，而是根据长期积累的，记忆深处的程式化语词、主题和结构并融入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来对史诗内容的重新演绎和创编。根据初步统计，在居素普·玛玛依所演唱的8部史诗中总计有173个完整的传统故事情节，有性格鲜明的大小人物100多个，还有数以十计的具有独特性格特征的骏马、雄鹰、猎犬等动物形象。这些动物各有其神秘的来源和鲜明的性格特征，与史诗的英雄人物一起构成史诗复杂的人物图谱，提升史诗内容的生动性、艺术性。173个故事构成史诗传统结构单元和章节，支撑史诗整体的结构框架。这些故事或主题按照内容分为神话类、战争类、日常生活类三种。其中，生活类64个占全部史诗内容的约37%，战争类73个占约42%，而其他内容则为神话传说类、家族谱系类、民俗知识类的内容。从这个粗略统计中不难看出，《玛纳斯》是一部全方位呈现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的典型英雄史诗，是一个人物众多、结构复杂的口头形式的超文本。

三

进入21世纪，我们对于英雄史诗的认识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对史诗的进一步深入探讨，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其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我国一提起三大英雄史诗，大家普遍认为是它们是藏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人民口头传统遗产，是一些活性态的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内涵和宏伟结构的民间文学作品，而对其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中华民族认同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对于其如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和认识还不足。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我国的三大史诗应该如何学习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想是我们当前应该全力探索的主要目标。

在当下，史诗的传承应该是多元化立体式的开发和展演形式上的创新，而并非只是文本的记录、翻译与出版保存，也不仅仅是让年轻史诗歌手作秀式的短暂演唱和表演。作为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文化遗留物，史诗不仅是古代的模糊的，而更应该是现实的当下的。只有让其融入当下的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潮流之中，并在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是对史诗最好的传承与保护。因此，史诗的文化内涵如何被激活，其中的文化原型如何再开发利用，如何让其古老内涵获得新生机才是我们当下的使命和任务。《玛纳斯》史诗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有口头形态的演唱，民间语境的文化空间，也有实物形式的手抄本、印刷本等，也有与其相关联的古墓、遗迹以及新建的纪念馆、博物馆、雕塑等实物性文化空间辅助传承。最重要的是，《玛纳斯》史诗也具备能够衍生出多种文本叙事形态的元叙事。中央歌剧院等多家文艺团体近年来所创作的各种歌剧、舞剧作品，美术、雕塑、小说、诗歌等便证明了其作为丰富内涵的元叙事的特征。因此，除了上述多种文艺形式之外，以电影、电视方式开发其中丰富的元叙事单元，《玛纳斯》史诗还可以为开发动漫、游戏等适合现代数字科学技术的新的艺术形式提供足够丰富的元叙事文化资源和故事原型。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书面文本解读和作秀式演艺层面，那必将最终丧失其最根本的文化根基和元叙事精神文化价值。只有以开放多元的形式重新对史诗加以阐释，深入挖掘其中的古老文化因素，在现代语境中为其寻找更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体现，并对其加以利用和开发，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才能让其回归现实生活，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用活态神话填充中华民族精神图谱

黄悦¹

神话从来都是特定民族想象世界、追溯历史，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因其古老独特而备受珍视。有人认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理性的昌明，神话已经成了纯粹的化石，

¹ 黄悦，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专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副研究员。

但真正深入民间生活就会发现，神话一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至今仍保有鲜活的生命。民间文学领域中的神话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类是历代典籍中记载的书面化的神话，二是至今仍然流传于民间生活之中的口头传播的神话。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通过全方位、系统性的搜集和整理为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都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在围绕《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卷》的调研和稿件审定过程中，我也更加体会到民间活态神话的瑰丽神奇和深远影响。

2018年9月，神话卷中的云南示范卷率先完成初稿。中国民协叶舒宪副主席和王锦强主任率神话组专家前往昆明与云南神话卷编纂委员会讨论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上下两卷上百万字的初稿。云南省境内有26个民族，号称“神话王国”，神话资源的丰富程度人所共知，但此时距离布置开展这项工作只有数月时间，这上百万字的成熟书稿究竟是如何高效完成的呢？经过云南省民协负责《大系》编纂工作的杨海涛同志介绍，我们了解到，在云南这样一个民族众多、神话丰富的省份，对神话的搜集和整理一直就是云南省民协的工作重点，多年以来，通过走访、调研和采集，已经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些宝贵的资料，经由这次大系出版工程的机缘而大放异彩。本次收录的阿昌族、白族、布朗族、布依族、傣族、德昂族、独龙族、哈尼族、回族、基诺族、景颇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纳西族、怒族、普米族、水族、佤族、瑶族、彝族、藏族、壮族等23个民族293篇神话作品，按照创世神话、诸神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等分类，纵横比对之中，共同呈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神话之根。

民间神话的扎实成果为学术研究夯实了基础。限于资料和条件，以往神话学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汉语典籍中的神话，对于民族地区的活态神话关注不足。国外神话学家历来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缺少创世神话，而立足于解释世界、人类和文明起源的创世神话是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创世神话，是指用神话故事的形式对世界、人类和文明的起源做出解释的一大类，由于神话原本的功能主要是对现有的世界秩序提供解释和证明，因此创世神话通常被视为整个神话体系的基石。在书面神话传统中，由于后世对神话不断进行体系化、历史化、哲学化的删减和提纯、以至于神话失去了原本的叙事特征，由此也引发了中国缺少创世神话的误解。在以往以书面文献为基础的研究中，这种偏见影响很大。事实上，在云南这片多民族聚居的神奇土地上，各个民族一直以神话表达着他们对世界、对

他者、对自我的想象和情感认同。佉族、阿昌族、白族、傣族、德昂族、独龙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都有非常丰富的创世神话，并且为人所熟知。除此之外，拉祜族的《厄雅莎雅造天地》、傈僳族的《木布帕造天地人》等都是具有生动的形象和情节的创世神话，很多是以往文献记载中没有看到过的。本次《大系·神话·云南卷》入卷的神话故事中，属于创世神话的作品有 100 则，豁然揭开了中国创世神话丰富宝藏的一角。

大系出版工程是在以往工作基础上的深化和扩展，代表了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也充分体现了各个不同地区神话流传的特点。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就展开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出版了各类省、市、县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神话资料，是研究我国神话的重要基础。但限于条件，当时的工作主要还是以记录文本的思路为主，划分也比较模糊。比如，对于神话这种特殊文体来说，除了讲述的内容，还需要关注的要素包括：谁在讲述，在什么场合讲述，以及向谁讲述。这些都可以概括为神话的外部要素，在以往的搜集过程中不太受重视。但这些外部要素，正是活态神话在传承的过程中与当下语境产生紧密联系和互动的关键。比如在《大系·神话·河南卷》中，收集了伏羲女娲神话在河南各地流传的不同版本 300 多则，其中淮阳 70 则、西华 49 则、新密 25 则、济源 20 则等。伏羲女娲神话是中国创世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表现形式多样。在书面文献传统中，伏羲女娲神话更多地与阴阳创世的思想结合，从而走向了哲学化的道路，在很多图像载体中都可以看到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缠在一起的创世图案。但这显然并不是伏羲女娲神话的唯一存在形式，在中原和西南民间还广泛存在着对于伏羲女娲的传说和信仰，这些传说因地制宜，与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等内容交织在一起，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80 年代，以张振犁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就在开展广泛田野调研的基础上，倡导对古典神话在中原民间的流变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带领下，涌现了一批扎根实践的民间活态神话研究成果，其中代表性的成果如杨利慧教授对女娲神话的研究。面对中原地区丰富的活态神话，很多地方学者也扎根乡土，做出了颇有特色的研究，比如马卉欣对桐柏盘古神话的研究，就与当地的名胜风物、民风民俗紧密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活态民间神话的系统搜集整理不仅是神话研究的需要，也是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的一面镜子。

为了尽可能还原神话的流传状态，本次编纂的神话卷中，特别增加了对代表性讲述人

的生平记录。比如佤族讲述司岗里神话的讲述者隋嘎、哈尼族民间歌手朱小和等人说唱的故事都生动细致。作为活态神话的传承人，他们是民族文化的守护者，也是创造和发展的主体，他们的成长环境、人生际遇、学艺经历都是对民间神话流传环境最细腻生动的反映，也是对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记录。

《大系·神话·云南卷》的隆重问世，堪称描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精神谱系的里程碑。这是民间文艺工作者长期耕耘的结晶，随着《大系》成果的后续推出，对于学术、文化发展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千年古县·干宝遗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 华东六省一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推进会 预通知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

第二届“千年古县·干宝遗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

华东六省一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推进会

大系出版工程浙江省卷编纂工作推进会暨专家审稿会

预通知

浙江海盐县，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人才辈出。拥有“千年古县”称号的海盐，文物古迹遍布全县，历史人物层出不穷，被誉为“中国志怪小说鼻祖”的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干宝，在海盐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搜神记》。这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

的志怪小说集，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干宝和他的《搜神记》，作为典型的海盐文化符号，在全国有其重要地位和影响。

为了贯彻落实中宣部指示精神，宣传推广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进一步加强新时期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根据已成功举办的“千年古县·干宝遗风”首届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提议，经多方研究协调，拟于2020年11月在浙江海盐县举行第二届“千年古县·干宝遗风”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华东六省一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推进会、大系出版工程浙江省卷编纂工作推进会暨专家审稿会。

一、指导思想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讲话和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和要求，切实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创作引导和人才培养，深度探索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发展史，确立新时代民间文学理念，特诚邀中国民间文学学术专家、华东六省一市民协负责人和省卷编委会代表、全国故事创作骨干、各大知名故事期刊负责人等，相聚海盐南北湖畔，共同研讨民间文学的历史记忆与未来展望，进一步促进我国民间文学创作事业繁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二、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盐县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

嘉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海盐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

《民间文学》杂志社
《山海经》杂志社
海盐县民间文艺家协会

三、研讨议题

（一）第二届“千年古县·干宝遗风”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

《搜神记》是我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典范，该书记录了魏晋时期广为流传的一大批古代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在后世仍有广泛的流播，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故事的代表作。同时对我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许多母题和类型在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研究干宝，研究《搜神记》，都离不开这一主题。本届学术研讨会拟以《搜神记》故事在后世的流传研究为主题，深度探索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发展史，助推当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与创作的繁荣兴盛。

（二）华东六省一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推进会

上海市、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民协负责人、省卷编委会代表交流编纂工作经验，相关专家组成员到会交流指导，研究解决具体问题，推进编纂工作进度。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邱运华等听取六省一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汇报并讲话。

（三）大系出版工程浙江省卷编纂工作推进会暨专家审稿会

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故事、小戏、俗语”专家组到会审读书稿，与编委会交流，指导解决编纂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四、“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征集

1. 举办方特约的稿件；
 2. 广泛征稿后的各地自由来稿。
- 《征稿启事》另行发布，敬请关注。

五、系列活动时间地点

1. 时间：2020年11月19日至22日
2. 地点：浙江海盐（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六、日程安排

11月19日（周四）：全天代表报到。

11月20日（周五）：第二届“千年古县·干宝遗风”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含开幕式）。

11月21日（周六）：华东六省一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推进会；会后部分代表可返程。晚上，大系出版工程浙江省卷编纂工作推进会暨专家审稿会。

11月22日，全体人员离会。

七、研讨会邀请范围

1.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领导
2. 浙江省、嘉兴市有关领导
3. 全国民间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代表（包括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者、故事期刊负责人、民间故事搜集者、新故事创作者）
4. 广泛征稿后邀请的作者代表
5. 上海市、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民协负责人、编委会代表；大系出版工程“故事、小戏、俗语、说唱、传说、歌谣、谜语”专家组组长或副组长
6. 《大系》浙江省卷各编委会主要成员
7. 中国民协、大系出版工程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国文联出版社“故事、小戏、俗语”

卷责任编辑

8. 新闻媒体记者



· 各地推进动态 ·

大系出版工程辽宁影戏分卷 踩“节点”推进

7月8日，辽宁省民协召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辽宁卷·影戏分卷》编纂工作视频推进会。会议听取了立项以来各编委先期材料收集情况汇报，辽宁影戏分卷主编隋丽就下一步编纂工作做出任务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并提出具体工作要求。辽宁省民协秘书长杨东乐及影戏分卷全体编委参加会议，会议由隋丽主持。

会上，杨东乐介绍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项目概况及2018年工程实施以来辽宁省民协编纂工作情况，并就做好影戏分卷编纂工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二是明晰工作目标，高标准、高质量、高时效地做好工作。要追求科学严谨的工作理念，牢牢把握“四性”原则，精益求精，尊重学术规律，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合作，形成合力，统筹推进；三是协会要发挥好协调联络作用，做好资金保障，学术支持等工作，从有利于工作、学术优先原则出发，发挥好协会的主体责任，确保做到沟通联络畅通，环节衔接紧密有序，工作高效务实。

会上，隋丽介绍了编纂的要求、体例和前期影戏分卷收集梳理情况，与编委会共同讨

论了影戏分卷的编纂大纲、影卷所选剧目以及影卷的复印与录入问题。自4月末项目批复以来，辽宁省专家学者迅速行动，在省民协的组织协调下，精挑细选辽宁省皮影研究方面业务能力强、专业水准高、年龄结构搭配合理的专家学者于5月初组建编委队伍，并马上投入到剧本收集、甄选工作之中。截至此次会前，已初步甄选出符合入卷条件、有传承价值、具有辽宁地域特色和代表性的皮影单出子以及折子戏53卷，连台本剧目76卷，为下一步编纂工作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会上，编委们一致认为皮影戏是辽宁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门类之一，此次影戏分卷编纂工作是对辽宁皮影戏剧目的一次系统梳理，大家有责任、有能力、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

隋丽听取了各编委的汇报，肯定了大家先期工作成绩，并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她希望各位编委充分认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重要意义，严守编纂工作“四性”原则，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有序做好编纂工作。针对下一步工作，她强调要把握工作重点，做好比照遴选，深入挖掘具有辽宁地域特色的皮影戏资源；要做好田野调查、老艺人走访调研等工作，努力掌握最接地气，最能反映辽宁皮影戏特点的资料；要把握编纂原则，严格遵守编纂体例，确保编纂工作科学高效完成；要明晰阶段性工作任务，克服现有不利因素，统筹划分时间阶段，确保整体工作进度。

会后，各编委将进一步开展剧本的去重补缺、甄选完善工作，按照编纂“四性”原则和整卷篇幅规模，做好下一阶段的编纂工作。

（辽宁省民协供稿）

“枣庄故事分卷”编纂工作吹响“集结号”

7月17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山东卷·枣庄分卷》编纂工作会议在枣庄召开。山东省文联主席团委员、省民协常务副主席王映雪，山东省民协主席团委员、副秘书长高光华，枣庄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枣庄故事卷主编王延亮，枣庄故事卷编委会成员等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枣庄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郭士祥主持，王映雪、王延亮分别讲话。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由中宣部统一部署、中国文联总负责、中国民协具体组织实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性任务，意义重大而深远。山东各卷的编纂工作是山东省民协和各市文联、民协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山东卷·枣庄分卷》编纂工作会议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山东卷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

枣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枣庄丰富的文化资源及人文历史，为编纂枣庄故事卷提供了优势和条件。枣庄市文联、市民协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按照要求拿出了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印制了《工作手册》，为编纂枣庄故事卷打下良好的基础。

会上，枣庄市民协名誉主席、枣庄故事卷执行主编沙朝佩介绍了枣庄卷编纂工作的前期准备情况和编纂时间节点安排，并对枣庄卷的编纂体例、注意事项进行了培训讲解。编委们进行了热烈讨论，研讨制定了下一阶段编纂工作的具体环节和标准。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严格按照中国民协、省文联的要求，克服一切困难，按照示范卷的标准编纂出科学、规范、高质量的山东枣庄故事卷。

（山东省民协供稿）

宁夏拟放《大系》《集成》“双响炮”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的十五个重点工程之一，《中国民间工艺集成》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也是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这“两大工程”，是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的重要任务，是全国民间文艺界近年来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国民协秉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仍然督导各省市自治区不懈怠不掉队，全面深入推进“两大工程”的工作进度。宁夏地处西北民族地区，为了帮助他们克服底子薄、任务重、专业人才缺乏等困难，更好地理解 and 执行“两大工程”的组织架构、编纂体例、工作要求和时间进度，7月20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一行来到了宁夏作实地调研和指导，得到了宁夏文联的高度重视和市县各级民协会员的热烈响应。

20日下午，在宁夏文联组织召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中国民间工艺集成》“两

大工程”编纂工作推进会，宁夏民协主席团成员，《大系》《集成》宁夏各卷本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宁夏民协主席刘伟主持。宁夏民协副主席、秘书长徐娟梅作为“两大工程”宁夏卷本的组织、策划和执行者，作了情况汇报。宁夏民协在市县区三级联动，发动宁夏民间文艺界力量广泛介入的同时，诚邀全区精、尖、专人才成立精干的编纂团队。同时，积极争取自治区财政厅、党委宣传部及文联配套经费，不断加大投入力度。2018年4月，《大系·故事·宁夏卷》作为全国示范卷，拉开了宁夏编纂工作的序幕。编纂期间，编纂团队多次向中国民协副主席、大系“故事”专家组组长万建中教授和中国民协副主席程建军虚心求教，高质量高水准故事卷2018年底如期交稿，并得到了中国民协邱运华书记的肯定和专家组的认可。目前，稿件经两次校对修改等待出版社反馈意见。钟亚军教授正倾尽全力完成《大系·歌谣·宁夏卷·花儿分卷》最后的修改、组稿、定稿工作。西北五省都有花儿，力争让宁夏花儿首先“绽放”，呈现它独特的魅力。目前花儿分卷基础资料成型，还有待于进一步征求专家意见，尽快定稿结集。《集成·宁夏卷》紧锣密鼓同步推进，但基础比较薄弱，对于宁夏的民族民间手工艺从未有人做过专业梳理并集结成册。宁夏文化资源匮乏且分布零散，人们对老物件管理和收藏意识淡泊，民间工艺代表性收藏展馆少，可入卷的工艺品不多。目前正按照活态传承的15个专业门类进行编纂分工、明确责任，每人负责4—5个专业门类，逐步完成资料采集与编纂任务。最后，徐娟梅也提出了编纂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惑。

潘鲁生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办国办的文件要求。“两大工程”在中宣部、中国文联的领导下，中国民协秉持学术立会传统，全面组织实施，是中国民协的一项重要任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的高度信任。项目启动以来，大家只争朝夕、全力推进，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去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隆重推出了《大系》的首批十二卷示范成果，包含1200多万字、300余幅图片，展现民间文学的历史风貌与新时代人文精神，产生了积极反响，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整理和出版发行的又一个重要标志。《集成》编纂工作也在稳步推进，目前已有九个省卷本提交图文初稿。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工程”任务，在规模上，十分宏大；在进度上，承前启后；在时间上，

较为紧迫。今年,《大系》还要完成40卷编辑出版任务,同时收齐70卷稿件进入编辑程序。《集成》应完成第一批示范卷10卷编辑出版,其他省市区应完成初稿阶段。我们要做到分地区、分类别、分项目、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各项事业;做到全国一盘棋,各省市自治区要比学赶帮超,激活分散资源,形成全国民协系统的合力和规模效应。宁夏要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地域特色,正在组稿的《大系·歌谣·宁夏卷·花儿分卷》目前已收录曲谱、歌词近80万字,同时注重了不同历史时期采录者、研究者关于宁夏花儿不同版本的收集与研究,打通历史脉络,观照文化流变,这是有特色有新意的编纂思路,值得赞许。对于《集成·宁夏卷》不必照搬《集成工作手册》中的民间工艺分类,立足当地当下文化资源,把握民族民间工艺的历史观、生活观和人民观,突出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就可以,不必面面俱到,要做到有差异、有重点。在会议的互动环节,潘鲁生对于大家所关切的问题,都作了回应和解答。

宁夏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樊虹代表文联党组作了表态发言。她对“两大工程”宁夏卷本各编纂小组的积极响应和辛劳付出,深表感谢和敬意。他们克服了人员少、任务重、编纂问题较多等困难,高标准严要求,不断推进“两大工程”在宁夏的落地实施。宁夏文联要高度重视民协的工作,在办公条件、人员配备、经费倾斜上给予切实的帮助和支持。同时,恳请中国民协给予精准辅导、业务培训,让宁夏民协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各卷编纂任务。

(中国民协供稿)

“广西歌谣卷”线上线下一无缝接

7月14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广西歌谣卷编纂工作会在南宁召开。广西文联一级巡视员、广西民协主席、广西卷领导小组副组长韦苏文,广西民协副主席蓝芝同、严琴和广西歌谣卷工作人员罗树杰、陆晓芹、刘小春、梁肇佐、徐秋明、王芳、谭力、农丽婵、陆世初、覃凤琴、谭群瑛(线上)、龙晓添(线上)等近2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韦苏文主持。

韦苏文结合大系出版工程歌谣卷编纂体例和广西歌谣的特色对广西歌谣卷编纂工作

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注意歌谣的分类，广西是歌海，歌类众多，在编纂过程中要注意歌谣的细化分类；二是注意歌谣内容，要严格按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广西歌谣卷编纂原则和标准来进行，选取时要注重区域性与民族性，同时要具有科学性、广泛性、代表性，对上世纪80年代后发现的有影响的民间歌谣可尽量采录，适当提高儿歌选取的比例，注意收录左右江和东巴凤革命歌谣、桂北红军歌谣等；三是注意少数民族语言和汉族各地方言的歌词的翻译，尽量做到“信”“达”“雅”；四是重视附记、注释、演唱者、采录者、简谱、小传等信息，要把握资料来源的真实性，选取有代表性的歌谣、传承人做重点采录。

此次会议采用了线上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在抗击疫情期间，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资源提高会议工作效率。会上，广西歌谣卷负责人罗树杰和广西卷办公室主任严琴分别介绍了编纂工作启动情况和上级相关要求，与会人员谈了各自的编纂情况、遇到的困难和工作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编纂任务，细化了广西歌谣卷的具体编纂要求，并研讨制定了今年各阶段的具体工作计划和目标期限，力争在今年年底完成广西歌谣卷初稿。

（转自微信公众号：广西文联网）

“青岛故事分卷”强化质量意识

7月12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山东卷·青岛分卷》编纂工作启动仪式在青岛手工艺博物馆举行。本卷主编、青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手工艺协会会长鲁汉主持会议，强调参与这项国家工程的重要性。副主编、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传军教授说明了编纂工作要从代表性、经典性、学术性角度对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要做到质量为先，争取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体现，将项目的生命力不断延续，引起社会共鸣。本卷内容选择突出青岛特色、海洋特色、崂山特色、民俗特色。编纂工作将按照民间故事编纂体例要求，对“三套集成”已出版的青岛地区民间故事进行筛选，对青岛各区市已经采集的民间故事进行汇总整理，对需要调研补充部分分组进行田野作业。

按照中国民协的要求，2020年12月31日前应完成编纂工作，时间紧、工作量大，

基本进度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宣传动员部署，组织所有编纂人员统一学习，规范编纂要求及编纂体例，进行工作分工；

第二阶段，资料收集、征集和田野作业；

第三阶段，编纂、校对、体例规范，最终成稿。

鲁汉、李传军、盛文强、郭贵荣、王睿璇、马琳、戴宗迪、王慧卉、宋玉凤、谢彬、王巧璞等编纂人员参加了启动仪式。

（转自微信公众号：青岛市手工艺协会）

“驻马店故事分卷”初见成效

7月5日，驻马店市举办《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河南卷·驻马店分卷》初选本编纂工作推进会，驻马店故事卷编纂专家组成员刘康健、耿瑞、谭咏利、余全有、刘海峰、刘献丽、郭永勤、赵新春出席会议。

根据驻马店编纂工作推进情况，已经形成了一个120万字的初选本，并按照类别进行了归类。会上，各位专家针对归类后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澄清后期编纂工作中的模糊认识，进一步理清编纂思路，把握编纂时间进程。会前，120万字的初选本已分别送给各位编辑，让大家提前对卷本进行通读，以便掌握存在的问题。会上，在驻马店故事卷主编刘康健的带领下，副主编余全有、赵新春分别对编辑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一一进行提出，涉及每个编辑的，每个编辑进行解答；涉及综合性的，大家在一起会商解答。然后，大家对初审本进行了逐页通读，对文字、体例、异文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对相同故事、交叉故事、土语的注释等进行了核实。

最后，刘康健对编纂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希望大家能够按照通稿会商精神，对需要修改的内容进行再修改、再推敲，同时加快进度，提升质量，争取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编纂任务，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文化财富。

（转自微信公众号：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大系·小戏·黑龙江卷》群策群力

7月28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黑龙江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黄锦秋,黑龙江省民协秘书长蒋丽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黑龙江卷》专家委员会成员及编委会成员等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蒋丽丽主持。

黄锦秋结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和黑龙江地域文化特色,对编纂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正确价值取向。编委会成员在工作中一定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选出具有较高文化价值、文学价值的优秀作品。

二是坚持广泛性和代表性相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黑龙江卷》既要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格,又要强调主流意识,更要注意民间文学小戏各类别经典文本的呈现和数据库信息采集等基础资源建设。

三是坚持精益求精。在整理、甄选、编辑上,务必尊重学术规律,力争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地打造出富有黑龙江地域特色、具有恒久价值的全国精品卷本。

此次会议采用了线上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会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黑龙江卷》主编孙亚强着重讲解了该项目的工作方案,各部类负责人介绍了前期调研成果,如86岁高龄的戏剧理论家靳蕾先生,无偿提供了收藏几十年的前辈评剧艺术家张凤楼(葡萄红)2出小戏手稿和17出传统评剧小戏剧本,及东北二人转拉场戏9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谷宝珍提供传统皮影戏剧本30多出等。

大会还进行了集中培训,孙亚强对《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纂工作规范、小戏编纂体例、工作方向、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讲解。

与会人员也谈了各自的编纂情况、遇到的困难,尤其是面临新冠疫情的复杂局面,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工作建议。通过本次会议,该项目成员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编纂任务,细化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黑龙江卷》的具体编纂要求,并深入了解了今后各阶段的具体工作计划和目标期限。项目成员尤其是青年学者都纷纷表示,虽然任务艰巨,编纂

难度较大，但有信心高质量完成编纂工作。

（转自微信公众号：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大系·故事·四川卷》强调精细化作业

7月28日下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四川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在四川省文联三楼会议室召开。四川省民协主席、四川故事卷主编孟燕，四川省民协副主席、故事卷执行主编李建中，参与编纂人员李菲、汪青玉、苏东来、彭丹等参会，并邀请相关专家蒋永志、贾斌与会。会议由孟燕主持。

孟燕首先强调了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重要性，认为此项目是继“民间文学三套集成”20余年后，我们国家在该领域启动的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工程，希望各位编纂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认真对待，高标准完成。会议按预设的汉族故事卷修改和民族故事卷编纂两个议题进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四川卷·汉族分卷》今年年初交至中国民协，经专家组审稿，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要求各位编纂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专家的意见完善文本，查漏补缺，争取早日将修订好的文稿交至中国民协，在编纂民族分卷的同时要注意避免专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会上，参与民族分卷的编纂人员轮流发言，汇报了各自的编纂情况以及在编纂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大家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和讨论，并对民族分卷各个民族的选稿、文稿字数、类型、文字处理等统一了处理方案，细化了编纂要求。

会议指出，民族分卷文稿的搜集、梳理、选编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但各位编者一定要按照大系“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原则编选，突出四川特色，尽心尽力完成编纂任务，争取年前按时保质完成民族分卷初稿。

（转自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徽州撒帐歌中的伦理叙事

章玉政¹

撒帐歌是伴随婚礼中的撒帐仪式而吟唱或诵念的民间歌谣。近年来，它在徽州乡村民间已有大量发现，其内容除了传递祝福、营造婚庆气氛外，更是在进行伦理叙事，承载与发挥对于婚嫁男女进行传统伦理教育的功能，是良好社会风尚与习俗形成的重要手段。

祝颂与祈福是撒帐之俗初始的功用。据元陶宗仪《说郛》卷三一引《戊辰杂抄》记载，汉武帝时，“李夫人初至，坐七宝流苏辇，障凤羽长生扇，帝迎入帐中共坐，僖欢之后，予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最迟到唐代，开始出现以口语传播为主的撒帐歌，早期多由文士主导创作，用词较为雅致，如敦煌文献中的《论开撒帐合诗》：“一双青白鸽，绕帐三五匝。为言相郎道：绕帐三巡看。”宋代之后，撒帐歌创作基本沿用固定的创作格式和表达意象，如以方位、数字、季节为逻辑框架，以鸳鸯、红烛、并蒂莲等为创作意象，仍重在表达祝颂祈福之意，不刻意注重内容本身，有些甚至直接采用《诗经》或唐诗宋词中的句子。但随着撒帐这一习俗在民间社会的普遍形成，明清以后，撒帐歌的创作主体逐渐从学养较深的文士转为粗通文墨甚至大字不识的乡俚文人、职业宾相或利市人等，由此带来了撒帐歌内容向口语化、乡土化、俚俗化、实用化的转型。这一点，在徽州撒帐歌中体现尤为明显。

徽州撒帐歌目前已发现的数量，仅笔者所见，不下于千余首，多为口口相传或即兴创作，也有被记录和传抄下来的，构成我们今天所见的撒帐歌册，通称“撒帐书”。这些撒帐书，极有地方区域特色，内容创作上虽有大致的套头，如“撒帐撒向东”“撒帐撒向春”，但主体部分却因人而异、因境而变，即便是颂祈的内容，也会被创作者有机嵌入诸多徽州

¹ 章玉政，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徽州归户文书与报刊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770002）系列成果之一。文章转自《光明日报》（2020年7月11日11版）。

元素，如山水人文，“撒帐撒向东，撒向黄山十八峰，峰峰都有珍和宝，不出黄连必出甘草”；如徽州方言，“今年插柏枝，明年驮娉媵”；如礼仪实态，“今夜兰房非从前，外面诸君听我言，但看两侯左右立，切闻众户利喧喧”，等等，但更多是伦理规范。

徽州是“程朱阙里”，儒家文化尤其是朱子的思想在徽州乡村民间有着厚实的沉淀，各宗族的伦理生活多以朱子《家礼》为主臬。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构结的纽带。徽州人十分重视婚姻之礼，深刻地看出了婚礼之于家庭乃至社会和谐稳定的开启意义，清雍正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在“昏礼议”中就指出：“将天地之大义、人伦之大经，王化从此始，礼乐从此兴，家之盛衰，国之治乱，皆于是乎在也。”于是徽州人总是要将婚礼视为人伦秩序建构的重要仪式，将道德伦理教化贯穿于婚礼实施的全过程，在撒帐的环节也是如此。一册1997年发现于屯溪的《清末民初撒帐歌》在开篇的前序中就指出，“礼重婚姻，实关人伦之大义”；一册出自歙县南乡、近代胡庆林藏《撒帐吉书》里有这样的唱词，“撒向西，人伦之乐礼光辉，红彩牵绣天缘定，幸似牛郎织女期”。具体说来，在徽州撒帐歌中，所要进行伦理教化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孝”是核心。五伦的关系准则中，“孝”字当头。清光绪绩溪许余氏《南关惇叙堂宗谱》明确写道：“五伦虽是君臣当头，但人人皆父母所生，要以尽孝为本。”在目前可见的徽州撒帐歌中，有关“孝”的伦理教化贯彻始终，多是按照儒家伦理所主张的主流话语规范对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性提出规训和约束，反复强调结婚后要敬祖宗、孝父母、孝公婆等，强调新嫁女“事舅姑，与子事父母之道同”。如笔者手头的一册2017年发现于屯溪老街的《民国年间徽州撒帐》，其“撒帐开场”就唱道：“新人今晚喜洋洋，昨日是做闺门女，今日从夫做嫂（娘），孝顺公婆为第一，敬重丈夫理应当，此年（言）须要劳劳计（牢牢记），免得旁人说短长。”类似的还有《撒帐吉书》中的一首歙县撒帐歌：“撒帐撒向春，媳妇贤良敬大人，保佑公婆年千岁，门前大树好遮阴。”这其实也是对朱子《家礼》中有关新嫁女伦理规训的响应与再造：“父起，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无违尔舅姑之命。母送至西阶上，为之整冠敛帔，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尔闺门之礼。”

第二，“传宗接代”是重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徽州人来说，婚姻“合二

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夫妇之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宗嗣的承续。徽州撒帐歌里，有关夫妇和合、早生贵子等内容不胜枚举。在夫妇关系相处方面，多为祝福之语，这在出自歙县南乡胡庆林藏《撒帐吉书》里就有记载，如“撒向北，孟光终有梁鸿配，胜似昆山之美玉，如鱼戏水成双对”“撒向中，一对鸳鸯在堂中，男东女西来婚配，一夜夫妻百世恩，三世修来同渡船，同偕到老永安宁”。当然，祝福夫妻和谐的深意还是向他们传递“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伦理使命，如休宁朱振钰抄《撒帐歌》等记载，“敬你新郎一瓜子，一对鸳鸯来到此，今晚洞房花烛夜，来年定产生才郎”“我敬新人一个栗，百年夫妇甜如栗，早生贵子早登科，生下孩儿都及第”“一对花烛送洞房，新人房里喜扬扬（洋洋），连胎生下三贵子，状元榜眼探花郎，合盃交杯之后，爹娘膝下做爹娘”，等等。

第三，“睦亲邻”是内在构成。和谐的社会重在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特别是古徽州，“山多地少”的客观现实，导致在南宋以后是高移民输出的社会，人们纷纷外出经商，明代时就形成男丁“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婚后的男性一般都要很快外出，一去经年，家里的事情大都交由妻子主理，因此，如何妥善对待和处理好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妯娌关系、邻里关系等，对徽州家庭和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对女性的要求也更高。徽州撒帐歌中就十分重视对“睦亲邻”的教化，如《撒帐吉书》里唱道：“撒向东，夫妻恩爱喜气浓，上和下睦成婚配，夫唱妇随梁孟逢。”在歙县东乡的一首撒帐歌里，唱有：“我敬新人一个枣，夫妻一世莫争吵，姑男小叔皆和睦，隔壁邻居都赞好！”在歙县南乡还有专门的撒“团圆帐”：“撒帐撒个大团圆，恩爱夫妻乐开颜。堂上公婆高兴，叔伯姆一团客气，姑嫂前后相逢。恭喜新郎，恭喜新人，福祿寿喜，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九世同居千年万年。”追求家庭、宗族、邻里的和睦是徽州社会风尚的主流，撒帐歌的颂唱是以乡土文学的通俗形式，宣扬儒家伦理，努力地将它们落实到乡村民间的文化认同之中。

第四，“忠”“义”是重要补充。徽州乡村社会既重视家庭伦理的教化，又自觉关照着国家和整个社会，强化“家国同构”意识，着意于超越个体、家庭等俗世生活之上的宏大伦理主题的培育。为易于被人们接受，徽州人采取了变通的教化方式，尤其是智慧地汲取了明清时期流行于徽州地区的戏曲元素，如《白兔记》《琵琶记》《牡丹亭》等，以戏

曲中的人物、故事及经历，通过轻松、幽默、感性的唱词来委婉地表达伦理的诉求。如在1928年歙县胡忠洵抄的《撒帐歌》里，唱有：“撒向东，周朝有个姜太公，文王接去按天下，武王伐纣才成功。撒向南，七姑仙女下江南，生下孩儿是孝子，偷下蟠桃奉母亲。撒向西，贫贵回家来过妻，夫妻分别十余载，后来做了状元妻。撒向北，三国之中刘玄德，桃园结义三兄弟，刘备定基管一国。撒向中，唐朝有个常侍公，侍公分支十八派，派派儿孙在朝中。”词句虽然俚俗，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却很明确。

道德重在培育，伦理重在教化。传统徽州社会曾延续了千百年的繁荣与稳定，揆诸原因，与徽州乡村社会善于利用各种途径展开伦理教化不无关联，撒帐歌就是典型体现，其创作者们在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展现徽州社会生活实态的同时，更是近乎全方位地进行着务实的伦理教化。这些在今天都有启迪意义。

· 论文推介 ·

◆《压抑与释放：论机智人物故事产生与流传的心理机制》

【作者】陈金文（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流传与人们的心理压抑密切相关。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人们的各种压抑都得到尽情的释放，一方面普通百姓成为社会斗争的胜利者；另一方面人们从礼教中解脱出来，冲决了日常生活中各种禁忌的罗网。同时，在机智人物故事中得以肆无忌惮呈现的还涉及不伦或原始的欲望，这些欲望一般情况下局限于意识领域或深潜于无意识领域。这些都是人们编织的白日梦，人们通过这种白日梦实现“精神紧张的解除”，释放种种心理压抑。

所谓机智人物故事即是围绕着机智人物展开的故事。该类民间故事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故事主人公（即机智人物）通常是“箭垛式”人物；二是故事通过主人公的言行塑造其诙谐、机智的形象，制造强烈的喜剧效果；三是故事一般都比较简短。在我国，机智人物故事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之后广泛流传于我国各民族民众当中。当前有关机智人物故事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角度多样，但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关于机智

人物故事产生、流传的心理机制方面的研究不多。了解机智人物故事产生与流传的心理机制，对于理解其思想内涵与社会功能有很大帮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课题。

一、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流传与精神压抑

呆女婿故事、机智人物故事都具有较强的喜剧色彩，应该同属于广义的笑话，而民间笑话往往具有狂欢色彩，这种狂欢通常是对平时所受种种压抑的强烈释放。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流传与“呆女婿”故事一样，也与来自各方面的压抑密切相关。笔者以为，机智人物是一种“集体心象”，通俗地讲，他是广大民众按照自己的心理愿望共同塑造出来的一种人物形象，借他来释放人们心理的压抑。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以反映机智人物与官、财主之间矛盾关系的为多。在封建社会，百姓与官府是一种完全的对立关系。在这种对立关系中，百姓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压榨，人格尊严更是无从谈起。这种现实中的压迫，自然会造成普通百姓心理上的压抑。再者，在封建时代普通百姓所遭受的另一种压迫来自于富人或财主。在旧社会，一些大财主不只靠地租与放贷盘剥农民，他们还往往交结官府，成为地方恶势力，鱼肉乡民。这种有形的压迫，自然也会造成普通百姓心情的苦闷与精神上的压抑。除了以上所述因阶级压迫所造成的人们精神压抑之外，人们还要承受礼教的束缚。中国是一个礼教社会，从先秦时期起就已形成的封建礼教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在中国，礼教作为“个人生活上极大的枷锁”自然会造成人们精神上的苦闷与压抑。直到今天礼教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活动，礼教所涉及的生活区域主要在人们的血亲与姻亲之间。一些民间故事中与机智人物构成对立关系的有时还可能是他的老师。传统社会强调师道尊严，但是，在现实中教师良莠难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老师虽无“师道”，也同样要享有“尊严”，这自然也会造成人们心情的苦闷与精神上的压抑。

人类的精神压抑，不仅来自现实中的阶级压迫或礼教束缚，而且也来自人类的“原欲”。这些“原欲”，在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看来，都是不道德、不合乎伦理的欲望或冲动，在进入父系时代之后大都逐渐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不过，就笔者看来，“原欲”中种种不伦的欲望或冲动，并不全部被约束于无意识领域。譬如，中国男性对妻子姊妹的种种性想象就算不上什么秘密，而且，相关的桃色事件也偶有发生。

综上所述，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和流传，与人们的心理压抑密切相关。这种压抑既来

自于有形的阶级压迫与礼教的束缚，也与潜藏于人们意识与无意识领域中的种种变态、乱伦的情结与欲望相关。

二、机智人物故事与“白日梦”

弗洛伊德所言“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可谓一语中的。弗洛伊德把白日梦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的观点，同样也适用于民间口头创作。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压抑就会有释放。机智人物故事正是千千万万普通大众的白日梦，他们通过这些白日梦满足其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满足的欲望，释放他们在现实中所遭受的精神压抑。

人们因阶级压迫所造成的精神压抑，只是在社会失序的状态下，才有短暂的机会在现实中释放；至于礼教及人们意识或无意识领域的不伦之念给人造成的压抑，在现实中则是没有或很少有释放或宣泄的机会。在民间机智人物故事中，人们的种种愿望都得到满足，普通大众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与狂欢。在机智人物故事中，本应神圣与庄严者被“降格”与“脱冕”，一切人物都有可能成为被戏弄的对象。机智人物故事表达了对世俗社会秩序颠覆的欲望。在这里一切制约人们行为的规矩都荡然无存，使得故事的讲述者与听众都在欣赏故事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释放。

在流传于民间，被民间文化工作者搜集后未曾公开的机智人物故事中，有不少是表现“原欲”中种种不伦欲望或野性冲动的。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并不总是正义的化身，有时候他们会是恶作剧的主角，身上体现出种种恶趣味。而这些恶趣味之所以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引发人们的精神愉悦，正说明人们身上普遍潜伏着一头恶的怪兽。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人们的各种压抑都得到尽情的释放。一方面普通百姓成为社会斗争的胜利者，体现在故事中官员或财主总是受到无情的戏耍或嘲弄；另一方面人们从礼教中解脱出来，冲决了日常生活中各种禁忌的罗网。一般情况下被压抑在意识领域或深潜于无意识领域的种种不伦的或原始的欲望，在机智人物故事中也得以肆无忌惮地呈现。当然，这一切胜利都只能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人们编织的白日梦。人们通过这种白日梦，实现了“精神紧张的解除”，宣泄或释放了精神世界的种种压抑，完成了一次次心灵世界的任性放飞。

三、结语

就机智人物故事的全貌来看，机智人物有时是人民智慧和力量的化身，有时则是一身

痞气的猥亵人物。人们以机智人物为核心编织他们的“白日梦”，借以宣泄与释放人生的压抑。“白日梦”所宣泄的压抑，一部分是正当的，是可以被人们理解的。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未被文明驯化的欲望在白日梦中也同样得到释放。这一部分如果加以理性考察，自然让人难以理喻。机智人物故事作为“白日梦”，当然仅属于“精神胜利”，只能给人以冲破精神枷锁之后的愉悦，然而这种精神胜利对于人的心理世界和现实行为都不无积极意义。

【刊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文本：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

【作者】惠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民俗学的整体转向，学界对“民俗”的理解由民俗诸物的“事象”转为民俗实践的“事件”。因为“事件”是可以建构语境的“行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言即是行”的立场，“行为构境”即是“语言构境”，故“文本”作为“语言性”的存在，也便由此具有了建构语境的能力，成为一种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行为）。晚近的美国民俗学界对于“文本构境”的讨论与人类学、语言学、哲学领域“语言本质观”的重大转折（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密切相关，并从诠释学中获得了最为深刻的理论支持，为我们重新思考“文本”的意义及其与语境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向度。

一、作为事件的民俗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民俗学研究的整体转向，民俗已经不再被看作静态的现成物，而是被注入了动态的视角，成为一种可以建构语境的“事件”。“事件”就是“行为”，亦即主体的民俗实践。

二、文本：以语言的方式存在

如果说传统观念是将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文本看成一种独立的、先在的、固化的文学性叙事，那么表演理论则是将其视作情境化的话语实现，凸显了它所具有的口头性特征。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既往研究中的“自主性的、传统性的、文学性的人造物”，还是表演视角下的“话语的实现”，其间最为关键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都是语言，若

无语言，文学或话语都无从谈起。

三、言即是行

马林诺夫斯基在一篇长文《原始语言的意义问题》中，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阐述了他对于语言的认识：“语言的原始用法是协调人类活动的纽带，它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是行动的方式，而非思考的工具”。在这一点上，荷兰语言学家范戴克(T. A. van Dijk)的讨论亦可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提供支持。范戴克认为，“语篇是一种交际双方‘互动的形式’，所谓互动，就是说某个人说话不仅是说出几个具有意义的句子，而是要给对方造成一定影响，更确切地说，就是要使交际双方通过语言的使用产生相互作用。换句话说，言即是行，这也是简·奥斯汀(J. L. Austin)给出的著名论断。

四、事件构境=文本构境=语言构境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鲍曼曾经说过的——“‘事件’，是指由文化所界定的，有界限的(bounded)一段行为和经历中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行动的一个富有意义的语境”，那么我们大抵可以做出以下推论：A. 语境由人们关注的事件所建构，事件即是行为（亦即人的民俗实践）。B. 文本以语言为存在方式，亦即一种语言性的存在。C. 因为“言即是行”，所以事件建构语境，即为文本建构语境。又因为文本是在语言中存在的，所以文本构境亦是语言构境，在具体的语用实践中，也有学者表述为言语(speech)构境、言谈(talk)构境、话语(discourse)构境等等。至此，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对于语言本质的变革性认识，文本的意义以及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理解。

五、语言学中的言说构境

现实由意义构成，语篇则是表义的事件，故此，我们也可以说，语篇构建了现实。这也就是说，现实的存在并不是物的杂乱集合，而是一个关乎意义的问题，这种意义来自语言；语言建构了有意义的现实，亦即我们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发现和理解现实。在笔者看来，语言学家们的观点与哲学领域“语言转向”所带来的语言本质观有着密切的关联。

六、语言“让”世界存在

前述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学科对“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文本的意义”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某种意义上都是对这一学术思潮及其中心问题的回应与衍生，而

对这些问题最为深刻的思考，无疑来自哲学领域。语言不是我们可以随时拿起或放下的工具，不是我们去认识一个对象世界的中介，正如加达默尔所言“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如果没有语言，世界于我们不过是一片没有命名、没有指称的混沌的云团，毫无意义可言，自然也就无从理解，甚至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只有在语言中，世界才会向我们开显，显示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有意义的存在。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表述才对人存在，人只有在语言的表述中才拥有世界，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世界存在的方式，甚或可以直接说，正是语言构造了我们周遭的世界。进一步言之，语言之所以是“存在性的”或曰“建构性的”，是因为它是一种活生生的过程，或者说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行动”——一种为我们开启世界的“行动”，一种将我们抛入世界并与之发生关联的“行动”。语言的存在就像一束光投射其间，原本混沌的一切豁然开朗，它们被命名、被指称、被认知、被理解、被赋予了意义，成为了它们所“是”的东西，就是那些被“语言所说的东西构造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语言的真实存在即是我们听到它时我们接纳的东西——被说出来的东西”，只有在语言中，世界才向我们显明为有意义的存在。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语词（语言）本身具有的创造事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让”世界（包括人自身）存在。同样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窥见了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行将论述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中的“语言（文本）构境”在本质意义上的思想之源。

七、民俗学—民间文学中的“文本构境”

人类学、语言学、哲学领域语言本质观的重大转折（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同样影响了美国民俗学界。文本作为一种具有构境能力的语言事件，对于民间文学的参与者而言也并无不同。“长工斗地主”的故事并不是对农民外在生存环境的“客观”反映，而是由文本开启的一个与“真实”日常全然相反的生活语境。不过，笔者认为，与其将其称为对“现实生活的戏仿”，不如视之为文本所建构的一种对现实生活具有影响的、指向道德、自由、正义、公平的意义语境，这也是语境研究自身所承载的价值诉求。

至此，文本已不是完全取决于语境的被动性存在，而是以语言为存在方式、具有语境

建构能力的行为或事件，具有其独立性。这也就意味着文本在一定意义上有稳定性，有能力跨越时空性语境（客观语境），并在不同的时空中开启新的意义空间（主观语境）。这里，本文并非否定客观语境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是强调客观语境研究固然有其效度然亦有其限度，由此提出另一个此前我们重视不够，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新的语境研究向度（亦是文本研究的向度），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明确的。

【刊载】《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文化实践

· 国内信息 ·

《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甘肃调研收获多

7月25日至26日，《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甘肃编纂工作组组长、甘肃省民协顾问、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王贵生，甘肃省民协副主席、天水师院文学院教授余粮才，甘肃省非遗中心研究员高莉花一行来陇南开展调研活动及集成编纂工作。

25日，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到武都区汉王镇陇南玉骄木石雕刻艺术有限公司、武都区文旅产品万象洞景区创业园、祥宇油橄榄产业园、时代陶艺馆等地，就陇南市开展非遗传承、民间工艺传承发展、文旅融合发展进行实地调研。

26日，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武都区琵琶镇张坝村古村落进行古村保护调研，后又与陇南民间工艺美术大师、陇南市民协理事赵世龙进行座谈并现场观摩民间工艺木雕、泥塑、彩绘制作。随后，调研组一行驱车二百多公里深入武都区隆兴镇符家湾村、蛇崖村、李河坝村、马家沟村考察民俗文化高山戏、羊皮扇鼓传承、民间剪纸等民俗事项并座谈。

甘肃省说唱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民协理事、陇南市民协副主席沈文辉，武都区摄影家协会主席王耀东等陪同调研，参加调研考察活动的还有甘肃省、陇南市民协会员、陇南市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赵世龙、李映文、马朝晖、孙光亮、叶谢平、张磊、马龙等。

（转自微信公众号：陇南市民协）

民间笑话村 专家线上评

7月24日下午，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成功举办了中国民间笑话村线上专家评审论证会，本次会议首次采用了“1+1”的线上评审方式，设立1个网络主会场和1个网络分会场，主要参会人员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列席会议。其中，主会场位于北京中国民协会议室，分会场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河沙镇镇大会议室。除了两个会场，另有来自上海、湖北、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几个省市区的40余个会议点分别上线参会。

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温州大学教授黄涛，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副主任、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主任白旭旻，相声表演艺术家宋德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继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施爱东，辽宁大学副教授隋丽，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副主任刘未，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故事基地管理委员会主任郁林兴，河北省邯郸市委讲师团副主任、市作协副主席白岳民，邯郸市民协主席赵立春，邯郸市邯山区河沙镇镇长汲胜利，河沙镇杜家寺村党支部书记王庆忠，以及河沙镇、杜家寺两委班子成员、杜家寺笑话故事创作团队成员，河北、河南、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地的民间故事作者、新故事爱好者百余人参加了论证会。

在北京主会场，苑利致辞。他表示，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入新时代，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征程，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故事人的信念和荣耀。将那些故事底蕴深厚、创新势能突出的乡村打造成为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中国故事村，就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故事基地”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我们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工作任务。

在邯郸分会场，申报方汇报了中国民间笑话村的建设发展情况，杜家寺村民还进行了民间笑话、故事现场表演。据介绍，杜家寺笑话历史悠久，以其幽默风趣诙谐的表演风格而广受欢迎，近年来，又多措并举，把笑话讲到邯郸市农民春节联欢晚会，以杜家寺笑话为蓝本进行舞台剧创作，采用真人演绎动画模式表演笑话，开发“畅笑”启蒙艺术课程，

筹备笑话演艺广场文化项目等，笑话已经成为杜家寺村的文化品牌。

在提问和答辩环节，与会专家深入了解杜家寺的笑话资源、传承现状及建设规划等相关内容并进行专题论证。经过一个小时的评审、论证，专家组对杜家寺村民间笑话的基本情况和未来走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填写“评审意见”，最后高票通过“中国民间笑话村”项目评审。他们认为，民间笑话具有古老的传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民间笑话村建设要立足地方文化，进一步挖掘笑话资源，加大基础建设投入，培养代表性传承人，利用网络进行输出和传播，有利于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主办方表示，此次会议筹备历时半年，会议筹备组提前将“申报书”及部分申报材料寄到专家手中，并严格遵循过去线下评审的规则流程，实现了不同地域的同屏、即时交流，保证了线上评审的科学、严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有序恢复正常的工作节奏，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将进一步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模式。

（中国民协供稿）

抗疫故事会唱响爱与希望的赞歌

为生动展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讲述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由中国民协主办的2020中国故事节·抗疫故事会近日在广东深圳正式启动。活动由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中国民协故事委员会、《民间文学》杂志社、深圳市亿国川新媒体传媒等单位共同承办。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海关关员、基层干部、下沉干部不辞辛苦、日夜值守，快递小哥、环卫工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各行各业工作者不惧风雨、敬业坚守。14亿中国人民坚韧奉献、守望相助，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用故事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抗疫英雄的事迹，记录疫情影响下普通中国人的坚韧团结、和衷共济，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关爱受疫情影响

的人群，积极有序参与复工复产和生活重建。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抗击疫情，唱响爱与希望的赞歌”，分为“故事创作、故事短片、故事音画、故事表演”等形式，综合运用文字、短视频、绘画等多种艺术手段讲述抗疫故事，共同期待工作生活早日恢复正常。

以本次抗疫故事会为平台，主承办方还将发起一系列公益慈善活动，帮助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家庭。

据悉，2020中国故事节·抗疫故事会活动将持续至今年年底，届时将举行慈善捐赠仪式，相关抗疫作品也将同步展出。

附 2020 中国故事节·抗疫故事会链接

2020 中国故事节·抗疫故事会“故事音画”征集启事链接：

<http://www.cflas.com.cn/resource//uploads/docs/20200715/27c8e646c5ed4b2d9521d95198d6685b.docx>（复制链接使用浏览器下载）

2020 中国故事节·抗疫故事会“故事创作”征稿启事链接：

<http://www.cflas.com.cn/resource//uploads/docs/20200715/08f789958ac84cc08bb4677ccd970592.docx>（复制链接使用浏览器下载）

2020 中国故事节·抗疫故事会“故事短片”征稿启事链接：

<http://www.cflas.com.cn/resource//uploads/docs/20200715/174a72e186ca4f25b23f8f6607c9eef9.docx>（复制链接使用浏览器下载）

（中国民协供稿）

· 国际信息 ·

◆坦桑尼亚中国文化中心发起“云游非遗”活动

7月下旬，坦桑尼亚中国文化中心依托文旅传播云在中心脸书社交平台发起云游非遗影像展之“这就是非遗”短视频系列宣传活动。

这些视频短小精巧，内容丰富，不仅向坦桑尼亚民众展示了中国非遗传人的精湛技巧，也向他们展现了新生代非遗传人的多样面孔。他们既是古老传统的非遗传人，又是顺应潮流的网络达人。他们固守慢工出细活的匠人精神，也不断在一日千里的网络空间里努力探寻传播途径。他们不希望自己所从事的非遗技艺只是成为一种保护对象，他们更愿意非遗成为大众审美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乃至期盼非遗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中国活化的非遗技艺和利用当下大众喜闻乐见传播方式推广非遗文化，对坦桑尼亚政府和民众都是很好的借鉴。坦桑尼亚有 120 余个部族，各部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服饰、节庆、生活习性等。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有些小型的部族正缓慢被同化。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坦桑尼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的新景观，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中。游客们到当地部落村庄中进行的旅游活动，通常也会成为他们旅行路线中的一个亮点。

（来源：中国文化中心，辑录：陈婷婷）

◆探索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新形式

7 月 29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方合作伙伴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以下简称 CIPSH）和腾讯在线上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推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助力全球数字文化产业及相关学术研究。

CIPSH 与腾讯将致力于通过更广泛的主体连接，共同推动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相互赋能。通过游戏、动漫、网络文学、影视、电竞等数字文化形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探索和创新，共同构建起开放、协作、创新的新文创生态，用现代科技连接人文知识和文化创意，激发年轻人对全球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未来，双方还将开展一系列战略合作行动来支持哲学与人文科学的相关学术研究。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爵士的推动下，于 1949 年 1 月 18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一道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学领域推动成立的三大国际学术机构。自成立以来，CIPSH 一直致力于推动人文学术的发展，是全球顶级人文学术组织。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辑录：陈婷婷）